

總第 22

APRIL 2026

左野黨™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中國民主黨主辦

门与灯

他说话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后来连他的名字
都需要低声提起

他们把人带走
动作很干净
像擦掉桌上的一行字
不留痕迹

于是世界安静下来
安静得
仿佛从未有人
问过什么

只有一些人
还记得

记得门被敲过
灯亮过
有人从屋里走出去

然后
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
有人替他立了一尊像
让石头替他说话

石头自然不会出声
但也不会改口

这大约
就是他们不太喜欢石头的理由

開篇 <u>Prologue</u>	01	目錄 <u>Preface</u>
02	在野黨簡介 <u>Contents</u>	03
思想火種 <u>The seed of ideas</u>	05	05-07
05-07	人物專訪 <u>Voices of Change</u>	08
08	民主火種 <u>The Spark of Democracy</u>	09
真相中國 <u>Truth China</u>	09	09-10
09-10	中共罪行 <u>The CCP's Crimes</u>	11-20
11-20	時事評論 <u>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u>	21-36
21-36	社會評論 <u>Social Commentary</u>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37	37-41
37-41	民運之聲 <u>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42-52
42-52	民運行動 <u>Democratic action</u>	53-54
53-54	民運同道 <u>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u>	連載 <u>Serial</u>
連載 <u>Serial</u>	55	55-57
55-57	作品連載 <u>Serialized Works</u>	檔案館 <u>Archives</u>
檔案館 <u>Archives</u>	58	58-59
58-59	迫害實錄 <u>Persecution Records</u>	60
60	中國記憶 <u>Chinese Memory</u>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61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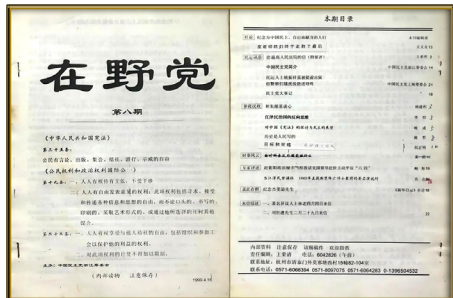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等待高智晟的第十七年

——专访高智晟律师家属一耿和女士

记者：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邢志远 美编：胡海宁



引用图片来自于 - 纽约时报中文网 - 网址: cn.nytimes.com

高智晟，中国人权律师，曾被外界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律师之一”。

他出生贫寒，靠着自学一步步走上法律道路，通过司法考试后，在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很快在业内崭露头角。那时的他，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前景，也完全可以像许多成功律师一样，在商业案件与现实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安全、体面的立足点。

但高智晟没有这样选择。

随着执业深入，他接触到越来越多普通人无力发声、也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弱势群体的维权、宗教信仰者的处境、政治异议者的申诉。这些案件往往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意味着触碰权力最敏感的边界。在中国多数律师迫于政治压力，对敏感案件避之不及，而他却一步步走了进去。

2000年代初的中国，正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叙事之中。高楼拔地而起，资本涌动，世界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那样一个普遍歌颂“发展”与“稳定”的年代，高智晟选择走向另一条路：他没有停留在繁荣表象之中，而是进入制度最幽暗的边缘地带，去触碰那些不被允许触碰的问题，去凝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人。

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冤成为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2004年底开始，他连续三次向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发出公开信，揭露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行动。这些信件措辞直接、内容尖锐，既带有法律人的理性，也带有一种几近孤绝的道德勇气。它们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让高智晟从一名执业律师，转变为当局重点打压和清

除的对象。

从那之后，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律师事务所被关闭，原本建立起来的职业生涯被强行中断。他本人则陷入长期的拘押、软禁、监控与强迫失踪之中。与许多政治案件不同，高智晟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明确的审判、一段清晰的刑期，然后一切结束；相反，他面对的是一种更为模糊、也更令人窒息的状态——反复发生的“消失”。长时间里，外界无法得知他的确切处境，也无法确认他是否安全。即便偶尔获释，也只是短暂回到公众视野，不久之后便再次进入同样的循环。这样的命运，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摧毁：它不只是剥夺人的自由，更是要摧毁一个人稳定生活，摧毁他与社会、与家人、与公共记忆之间的连接。

关于他在拘押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外界至今仍难以获得完整而权威的答案。人们只能通过极少数流出的描述，拼接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长期隔离、严密监控、持续施压，以及那些始终难以被完全证实、却又从未真正消散的酷刑指控。正是这种“无法被证实”的状态，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因为它让暴力不必公开，也不必承担解释。

2017年，高智晟再次失踪。

自那以后，关于他的下落，始终缺乏公开、明确、可信的信息。多年过去，一个曾在中国法律界公开执业、曾以文字和行动震动国际社会的人，就这样在中共制度深处被“抽离”出公众视野，仿佛一个名字仍在流传，但一个具体的人却被有意从现实中抹去。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律师职业道路的悲剧性终结：一个本有才华、有理想、有影响力的人，被权力机器层层碾压，最终归于沉寂。

把他的经历放到更大的时代语境中来看，它显然不止于个人悲剧，而是制度性现象的缩影。

2026年在美国加州雕塑公园，一座以高智晟的雕像落成。人们在现场集会、发言，而高智晟律师本人依然被囚禁在中国。

《在野党》杂志社有幸采访到高智晟律师的家属——耿和女士。

问：

耿和老师，如今在很多人眼中，高智晟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更像是一种象征。那么，在家

庭里、在您的心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耿：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幽默，而且极有智慧的人。真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他还很会唱歌，而且唱得特别好听。

如果说他的为人，我会说，他特别善良，也特别正直。正是这些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一家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2005年3月，高智晟的母亲去世了，去世时才67岁。自那以后，他每年回陕北老家，无论是一年回去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每次回去，他都会专门去看望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并给每位老人送上20块钱。虽然钱不多，但那份心意非常珍贵。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点物质上的表达，更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体贴和对长者的尊重，也代表着一种非常可贵的中国传统美德。

问：

作为家属，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会带来危险，是在什么时候？

耿：

应该就是在2006年。那年8月15日他被抓捕之后，我们家就一直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家门口有人跟踪，家里也住进了警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仅仅是承受压力，而是随时可能付出自由甚至更沉重的代价。

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抓捕。虽然我们已经开始能感觉到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我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发展到那一步。

问：

当高智晟律师面临的政 治风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您和他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争执？

耿：

我和他之间没有过这样的争执。因为在我们家里，我更多是负责家庭这一边，他主外。在国内的时候，他也很少跟我讲这些事情，很多事他都是自己在承担。

问：

高智晟律师失踪以后，对您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还是一种漫长而持续的消耗？

耿：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还是抱着一点希望。因为有时候他会消失三天、两天，我们就会想，也许再等一等，他就回来了。我甚至会拿着给他准备的钱，心里想着，他大概还是抱着“我明天就能回来”的念头离开的。

可是后来，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原本以为只是几

天，结果变成了两个月、几个月，最后变成一种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那种感觉，不只是恐惧，更是一种无止境的消耗。你一直在期盼，一直在等，一直在盼着会不会突然有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到后来，我几乎像看天气预报一样，时刻关注外界的变化，总觉得是不是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是不是哪一天，就会传来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就是这样，在盼望和失望之间，一天天熬着，整整盼了八年零八个月。

问：

这些年来，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主要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耿：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往前走，也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我也一直在学习，慢慢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调整好，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把眼前的每一天过稳。只有先把自己撑住，才能继续走下去。

问：

耿和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话，是一直想对高智晟说，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

耿：

其实，我常常也会想这个问题。但到了今天，我觉得自己最想的，已经不只是说一句什么话，而是如果每天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力量，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这样的分离，已经持续了17年。到了今天，我们能做的，好像已经不只是等待，而是继续坚持，继续想办法营救他。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更像是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士，仍然在为把他救出来而努力。

问：

今天，我们在美国加州的这座雕塑公园里，看到了这座关于高智晟的雕像。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耿：

这座雕塑从开始筹备、制作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它承载的不只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也承载着陈维明老师的心血和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高智晟，关注高智晟，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迎来一个好的结果。

说实话，我今天是发自内心地感动。你看，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大家都愿意来到自由雕塑公园，愿意为高智晟律师的雕塑落成仪式伸出援手，愿意关注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希望高智晟被囚禁、被失踪的日子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更希望，有一天高智晟能够重新回到公众面前，重新回到家人面前，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亲眼看到这

座雕像。

问：

您觉得，如果高智晟本人今天站在那里，看到这座雕像，他会说些什么？

耿：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这座雕塑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高智晟个人。它承载的是一个真相，也是一种揭露。它让人看到，在暴政之下，一个因为说真话、因为坚持良知而遭受迫害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高智晟的雕像就像一面镜子。透过这座雕塑，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更能看到中共暴政本身的丑陋和残酷。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里，高智晟律师的雕像静静矗立。

它沉默无声，却仿佛始终在传递着某种讯息：即使身处黑暗，人依然会抬起头，去寻找光的方向。

对于耿和来说，时间从来不是简单地流逝。它被分解为漫长的等待、反复的回忆，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

这些片段拼凑出了一种更为具体、也更为沉重的现实。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仍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但也许，正如那尊雕像所隐含的意义：人未必总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却仍然可以选择——在黑暗中，仰望星空。



编者按：

高智晟律师的被中共当局“失踪”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权力运作方式：惩罚并不以法律程序的终结为终点，甚至很多时候，真正沉重的打压发生在法律程序之外。行政权力、国保体系、社会控制、信息封锁、职业剥夺、人格污名化——这些机制交错运作，使一个人即便在形式上“服完刑”或“结束处理”，其身份、权利与行动空间，仍然被随时重新定义、重新限制、重新剥夺，乃至强制失踪。高智晟的失踪，绝不只是针对他个人的迫害，更是中共当局向所有仍试图在制度框架内争取权利、推动改变、坚守原则的人发出的一种威胁与警告。

而这，也正是“高智晟”这个名字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他的意义，早已超出一个律师的职业范畴，也超出一桩个案本身的范围。他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注脚：当法律不再是限制权力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当程序不能保证正义，反而可能被用来包装压制；当一个以法律为武器的人，最终被法律与法律之外的力量共同吞没——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重新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当法律本身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时，个体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来保护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高智晟用自己的一生，提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诘问。

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Waiting for Gao Zhisheng: Seventeen Yea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fe, persecution, and prolonged disappearance of Gao Zhisheng,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ourageous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history. Born into poverty, Gao rose through self study, passed the national bar examination, and established a successful law practice in Beijing. He could have pursued a stable and prosperous career within the system, but instead chose to represent vulnerable groups whose cases were often avoided, including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His defense of persecut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marked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Through a series of open letters addressed to top Chinese leaders, he exposed systemic abuses and called for an end to repression. These actions brought him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but also made him a direct target of state power. His law license was revoked, his firm was closed, and he was subjected to repeated detention, house arrest,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Unlike conventional legal cases, Gao's persecution did not follow a defined judicial process. Instead, it became an ongoing cycle of disappearance and brief reappearance, creating extended periods during which his whereabouts and condition remained unknown. This pattern reflects a broader system in which punishment continues beyond formal sentencing, operating through extralegal mechanisms that obscure responsibility and eliminate transparency.

Since 2017, Gao has once again disappeared, and no verified information about his situation has been made public. His absence has transformed him from an individual lawyer into a symbol of systemic repression. His wife, Geng He, describes years of waiting shaped not only by fear, but by prolonged uncertainty,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daily struggle to sustain hope in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In 2026, a statue of Gao Zhisheng was erected in a public park in California, drawing renew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his case. While he remains missing, the memorial functions as both remembrance and indictment. It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extends beyond one individual: when legal institutions become instruments of power rather than constraints upon it, to what extent can individuals rely on law for protection.

Gao's story is not only a personal tragedy,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a broader reality. It highlights enduring questions about justice, accounta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legal protection under concentrated political author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让“执法的温度”照进北海的高墙

——致司法部贺荣部长的一封信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尊敬的贺荣部长：

我是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刘春丽。

几天前，我在新闻中关注到您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的讲话。您提到，要“用执法的力度体现法律规定的刚性约束，用执法的温度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谐”。作为一名正处于法律风暴中心的公民家属，这番话令我倍感振奋，也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

今天我提笔致信给您，是想向您反映我丈夫金明日及其同工案件中，正面临着一种缺乏“温度”、甚至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寒冷的现状。

一、您说“律师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正面临压力

您曾多次强调，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一支高素质专业力量”。然而，在目前我丈夫所涉及的“非法使用信息网络”案件中，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们，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困境。

近期，多名代理律师反馈，他们因履行正常的辩护职责，不仅被频繁“约谈”和“警告”，甚至有人被吊销执业证。还有一些律师的家人被约谈，被恐吓。被要求从给锡安教会做辩护律师的事件中抽身。如果如您所言，“依法维护律师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那么当辩护律师的声音被行政手段压制时，我丈夫作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二、请让“执法的温度”落到实处

我丈夫金明日是一名牧师，他所从事的工作始终是为了引导信众向上向善。即便目前由于法律适用（如《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存在争议而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也渴望能在一个阳光、公正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分歧。有刑辩律师为他们辩护，可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您主张要“构建良性互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在本案中，律师们面临的压力却在破坏这种互动：

- 辩护的缺失：如果最优秀的律师因为恐惧而退缩，法治的“刚性”将变成冰冷的行政碾压，而非公正的裁决。

- 保障司法程序合法：我得到的消息是，锡安教案在公安侦查阶段在已经延期两次，在4月18日还未到来之际，又一次被告知延期。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延长至什么时候的具体日期！

三、我们的微小期许

部长先生，您曾提到要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义不应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它应当体现在北海看守所每一次律师会见的顺畅中，体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中，体现在保证律师不被威胁。司法程序正常合理运行中！

作为家属，我诚恳请求司法部：

1. 切实保障金明日案件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请停止对这些履行职责的律师进行不必要的约谈与行政干预，撤回不合理的处罚。

2. 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让法律的争点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在法庭之外通过限制辩护权来提前“定案”。

3. 彰显“执法的温度”。考虑到我丈夫的身体状况（糖尿病）以及案件的特殊性，恳请司法机关在程序中给予基本的人道关怀。

结语

您说要“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我想，如果这种正义能包含对一名牧师辩护律师的宽容与尊重，能包含对法治程序的坚守，那么这种“温度”将不仅温暖我们一家人，更将温暖整个中国律师群体，温暖所有对法治抱有信仰的心灵。

愿您的法治愿景，能从每一份不被干预的辩护词，司法程序公正，敞开始始落实。

谨此。

刘春丽（金明日妻子）
2026年3月18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 23 期

(2026 年 4 月 4 日)

人权观察部：张维清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引用图片来自于 -BBC 中文 - 网址: www.bbc.com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高智晟，1964 年 4 月 20 日出生，籍贯陕西省佳县。原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2001 年被中国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律师”。他以代理底层民众维权案件著称，被誉为“中国良心”和“维权运动先行者”。因大规模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维权律师之一。

最新近况：

1、强迫失踪超 3156 天：截至 2026 年 4 月 4 日，高智晟律师自 2017 年 8 月 13 日被从陕西老家带走后，已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已达 3156 天。中共当局始终拒绝透露其关押地点或生存状态。

2、雕像落成：2026 年 4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多人权活动人士为高智晟的雕像（名为《仰望星空——高智晟》）举行了揭幕，以纪念这位失踪多年的“中国良心”并呼吁各界持续关。雕塑展示了高智晟在黑暗环境下依然守望良知、追求法治的精神。

一、个人简历

1、贫寒出身与军旅：出生于陕西陕北，因家境贫寒未能读完中学，曾入伍参军，并在部队自学法律。

2、职业巅峰：1996 年开始执业。2001 年，因免费为底层民众代理医疗事故、强制拆迁等维权案件，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律师”。

3、突破禁区：2004 年起，他突破禁区代理多起政治及宗教敏感案件，包括朱久虎案、太石村罢免案，并三次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二、政治立场

宪政民主支持者：高智晟在秘密撰写的著作《2017 年，起来中国》中，从人权律师与基督徒的双重视角预

言了中共体制的崩塌，主张在中国建立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体制。

拒绝收买：他曾拒绝国企巨额利诱，坚持为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援助，主张“良知重于黄金”。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2006 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3 年、缓刑 5 年，期间多次被失踪、酷刑。

2011 年：在缓刑期满前夕，被撤销缓刑，转入新疆沙雅监狱服实刑 3 年。

2014 年出狱后：回到陕西老家被长期软禁。因狱中长期酷刑及缺乏营养，50 岁时牙齿基本脱落殆尽且无法就医。

2017 年 8 月 13 日：在维权人士协助下逃离陕西计划看牙，随后在山西被捕并再度失踪至今。

四、社会评价

国内维权群体尊称其为“中国良心”、“维权运动的教父”。他以一己之力公开挑战体制黑箱，展现了极高的道德高度。

五、国际评价：

诺贝尔奖提名：曾于 2008 年、2010 年等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政府施压：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会曾多次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对其骚扰并恢复其律所资格。

人权组织关注：国际特赦组织、Front Line Defenders 及 Human Rights in China 等机构持续将其列为重点营救对象。

六、《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停止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向其家属耿和及国际社会出示高智晟存活的证明。

保障基本医疗：鉴于高智晟在失踪前已满口牙齿脱落，健康状况危急，必须确保其获得专业医疗照顾。

推动法案落地：呼吁美、欧各国加速通过《高智晟法案》，利用外交及制裁手段（如禁止涉案官员入境、冻结资产）营救失踪的人权律师。

全社会关注：在每一个 8 月 13 日“高智晟失踪日”，我们呼吁所有正义人士在网络和线下为“中国良心”发声。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2026 年新版“709”

——从谢阳五年重刑到于凯、包龙军、王宇等律师集体受难

作者：张维清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2026年3月底，中国维权律师界正经历着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最黑暗、最肃杀的时刻。从长沙法庭的重刑判决，到北京派出所对多位知名律师的集体传唤，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系统性清洗正席卷全国。这不仅是对个别律师的政治报复，更是对中国残存法治文明的全面绞杀。

这场悲剧的序幕在2026年3月23日正式拉开。当天，长沙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知名人权律师谢阳有期徒刑五年。这份长达五年的刑期，是对谢阳律师多年来坚守良知的公然羞辱。谢阳被构陷的所谓“罪证”，仅仅源于他作为法律人的基本道义：他在互联网上记录真实的社会苦难；在媒体采访中撕开权力滥用的遮羞布；在2021年大雪纷飞的湘西，他无畏地声援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怀孕教师李田田。自2022年1月被捕起，他在长达1532天的非法羁押中，经历了剥夺睡眠、沉重镣铐与人格侮辱等摧残。联合国已正式认定此案为“任意拘留”，指控其涉及“危害人类罪”，但施暴者依然在审判台上装聋作哑。

就在谢阳被重判的阴影下，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凯律师也因践行公民监督权而身陷囹圄。3月26日，于凯律师在司法部门前公开举牌，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直指其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然而，在行使宪法赋予的举报权利次日，于凯便被警方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由强行带走。最新的确切消息证实，于凯律师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于凯的遭遇揭露了一个荒诞且残酷的现实：在这个体制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当律师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反腐，法律本身却成了贪腐官员的遮羞布和私家刑具。

这种打压并非孤立，而是一场更大规模、针对“709”群体及其辩护团队的围猎。就在于凯被捕的同时，北京警方正采取大范围的传唤行动。同一派出所已正式传唤“709案”的核心人物包龙军、李国蓓律师、张新年律师前往派出所。与此同时，警方也已通知王宇律师前往派出所受审。包龙军与王宇作为中国维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多年来持续遭受吊照、监控与边控。对多位知名律师的同步传唤，释放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政治信号：当局正在对中国独立律师群体进行“二次定点清除”。这不



引用图片来自于 - 大纪元 - 网址: www.epochtimes.com

再是个案的敲打，而是一场旨在彻底切断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救济渠道、消灭独立法律职业阶层的系统性运动。

从谢阳的“五年重刑”到于凯的“实名举报被捕”，再到对包龙军、王宇等人的集体围捕，这些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定义的系统性人权迫害。这种大规模、系统地利用司法机器打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行径，早已跨越了现代文明的底线。这种“709”模式的延续，说明当局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法治的伪装，转而进入了一种赤裸裸的特务统治与恐怖政治。

我们在此向全球正义人士、国际律师协会及人权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必须立即释放谢阳、于凯律师，并停止对包龙军、王宇、李国蓓、张新年等律师的非法骚扰与迫害。同时，应记录参与此次大清洗的每一名办案人员与政法官员，将其列入国际人权制裁名单。

历史的审判台早已搭好，当法庭变成马戏场，当监狱关满了正直的律师，再次证明这个体制的合法性早已彻底崩坍。中共可以关住这些律师的身体，可以撤销他们的执业证书，但关不住天底下的公义。我们坚信：真相无罪，良知无罪，法治的火种终将在黑暗中重新点燃。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白发老人

作者：马雪丰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们习惯把目光投向强者，仿佛只有掌握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书写时代。然而真正推动社会前行的，往往是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出来的普通人。

广东信宜的民众抗争持续多日。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中，一位白发老人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没有退缩，只是举起手中的一枚鸡蛋。

那一刻，没有激烈的动作，却令人震撼。

她没有力量优势，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现实意义上的胜算。从表面看，这是一场悬殊的对峙。但她依然站在恐惧与压力面前。这个简单的举动之所以沉重，不在于它能改变什么，而在于它表达了一个态度——不再沉默。

当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位年迈的老人，都选择发声，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信号。

回望历史，许多后来被铭记的人物，在最初的时刻也只是常人。他们并非天生强大，而是在某个关键节点，做出了不同的决定：选择承担，选择表达，选择不再退让。历史的改变，往往就从这样的选择开始。

岭南大地向来务实坚韧。不尚空谈，却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想，也敢做”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被现实反复印证的品格。

那一枚鸡蛋很轻，却承载着沉重的象征意义。它不是武器，而是一种朴素而直接的表达：面对压力，我仍愿意站出来。

表达本身，就是对恐惧的突破。当这样的瞬间被看见、被传播，它就不再只是个人行为，而会在更多人心中留下痕迹。也许微小，却会积累力量。

很多人关心：这样的抗争，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吗？

历史很少因为一次事件而立刻改变。真正的变化往往来自长期积累，在不经意的时刻越过临界点。



深层次的社会转变通常经历相似的路径：少数人发声，引发更多人思考，一部分人从旁观走向认同，共识逐渐形成，改变才具备现实条件。

因此，比起追问结果，更值得思考的是：有多少人开始重新审视现实？有多少人不再习惯沉默？又有多少人，在心里做出了表达的决定？

真正的转折，不始于胜利，而始于发声。

那位白发老人或许不会知道，她的举动被多少人看到。但正因为她的普通，这个选择才更具力量。历史并非只由伟人书写，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决定共同构成。

一位老人，一枚鸡蛋，也许不会立刻改变现实，却会被记住、被传递，在人们心中留下回响。它可能成为一个起点，让更多人开始思考：面对不公与压力，我是否也应当表达立场？

历史，正是在这些看似微小却不断出现的瞬间中，缓慢写成。

也许个人的选择无法立刻改变世界，但它能够改变人心。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时代的方向，终将发生转变。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勇敢的人。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信宜事件：信息失真与高压维稳下的民意困局

作者：马群
编辑：黄吉洲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3月，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一起围绕殡仪馆建设项目的争议，在短短数日内迅速升级为持续性的群体性冲突，并引发外界关注。

3月16日，信宜市政府发布“颐福园”殡仪馆项目公示，拟选址马六塘，项目投资约1.45亿元，计划于当年3月至12月建设完成。公示称，项目周边500米范围内无居民。然而，这一说法很快遭到当地村民的普遍质疑。

多位村民反映，此前相关土地征收是以“修建励儒大道”的名义进行，并未明确告知将建设殡仪馆项目。更令村民不满的是，实际选址与官方公示存在明显差距：距离旺涌村不足700米，距五胜村约200米，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约600米。对于一个具有明显邻避属性的公共设施而言，这样的距离使村民难以接受，也加剧了对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质疑。

3月17日，数百名村民前往村委会聚集，要求政府撤回项目并公开真实情况。随着现场警力增加，局势迅速紧张，防暴警察进场维持秩序。在随后的冲突中，警方采取强制措施驱散人群，现场出现推搡与混乱，有村民受伤并被带走，矛盾由此激化。

3月18日至19日，抗议行动进一步升级。部分村民转至信宜市政府门口集结，挥舞国旗、高喊口号，表达诉求。随着情绪升温，现场出现向警方方向投掷石块和鸡蛋的行为。与此同时，警方不断增援，对周边道路实施封控，双方形成持续对峙。有消息称，部分村口一度出现停电情况，使外界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状况。

在连续三天的冲突之后，当局迅速加强管控措施。自3月20日起，大量特警力量进驻水口镇及周边区域，强化巡逻与布控，试图以高压手段遏制事态扩散。村庄整体氛围趋于紧绷，人员流动与信息传播均受到明显限制。

然而，3月25日，在持续高压之下，仍有村民再次走上街头表达反对立场。这一行动发生在管控尚未解除的背景中，因而更具象征意义：即使在强力压制之下，部分民众仍选择发声，而非完全沉默。

从整个事件的演变来看，这不仅是一场典型的“邻避冲突”，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当官方公示与民众感知出现明显不一致时，信任基础便会迅速动摇。其次，是决策过程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对于高度敏感的公共设施选址，如果缺乏充分沟通与协商，任何单方面推进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弹。

更值得关注的是应对方式。当局在冲突升级后，主要依赖警力介入与高压管控来恢复秩序。短期来看，这种方式能够迅速降低街头对抗的强度，但从长远看，却可能加深对立情绪，使问题从具体项目争议，转化为更深层的信任危机。

3月25日村民的再次集结，正说明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高压可以压低声音，却难以消除不满。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诉求并不复杂——不过是对生活环境、安全感以及基本尊严的守护。当这些最基本的关切被忽视时，街头便成为最后的表达出口。

在现实条件下，这类抗争往往难以改变既定决策。项目或许仍将推进，参与者也可能承受各种压力。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一场难以取胜的行动。但其意义，并不止于结果本身。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制度性表达渠道不足时，社会张力终将以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信宜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村民的呐喊，也许无法立即改变项目走向，却让人看到，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中，仍有人试图守住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如果类似问题的根源得不到正视，那么信宜不会是孤例。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维稳”，而是如何让民众在不走上街头的情况下，也能被认真倾听。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斩杀线之国：共产党如何系统性剥夺权利

作者：彭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近来中文舆论中流行所谓“美国斩杀线”的说法：一旦失业或生病，美国中产就会迅速坠入流浪、死亡的深渊。这类叙事往往通过混淆低收入脆弱群体与中产阶级、嫁接极端个案，制造出强烈的情绪冲击。

不可否认，美国社会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族群歧视等，这些问题本身也值得批评和反思。但必须明确的是：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统治是否正当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联。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它是否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通过对比他国的缺陷来获得心理优势。这类“比惨”叙事之所以在当下广泛传播，是因为它充当了一种精神止痛药。通过不断强调“全世界都一样，甚至更糟”，让对独裁制度的追问被悄然替换为认命。

下面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系统性“斩杀”：

1. 《宪法》就是废纸

任何现代社会的权利体系，都建立在权力受到约束的前提之上。但在中国，宪法长期停留在象征层面，无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成现实约束，只是一份政治宣传文本，而非可被公民依赖的权利保障。司法从未独立，在现实中，“党大于法”人尽皆知，法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以法律条文作为准则。

201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修改取消，清楚表明宪法可以被权力按需要调整。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推动宪法为个人权力服务时，宪法对普通人的保护效力已经归零。

2. 未出生即被斩杀：计划生育与强制流产

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有一部分生命甚至来不及出生，就已被独裁制度提前终止。共产党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强制流产、强制引产成为常态化行政行为。

在这一政策下，生育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纳入

政治考核的指标。妇女的身体被视为政策执行对象，胎儿的生命被简化为“超生数量”。当一个社会可以为了抽象目标而系统性地终止未出生的生命，生命本身就不再被视为权利主体，而只是可被管理、可被牺牲的资源。

3. 农民：长期被牺牲的多数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大、却最缺乏权利保障的群体。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财政积累贡献了一生，却始终被排除在完整的权利体系之外。

共产党事实上拥有中国全部土地，农民并不拥有真正的土地产权，所谓的产权只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不能交易，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进城务工却难以获得完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边缘生存。他们贡献了粮食、劳动力与社会稳定，却在晚年只得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养老金。医疗、养老、失能风险，被系统性地下沉到家庭，导致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在官方叙事中，农民被称为“奉献者”，但在制度现实中，他们从未被当作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来对待。

4. 教育沦为思想控制与精神驯化的工具

在中国，教育并非以培养独立思考为目标，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思想控制与社会筛选机制。其核心并不是鼓励质疑、讨论与判断，而是反复训练对规则的服从、对单一标准答案的接受，以及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被动认同。

在这种体系下，教育不再承担培养公民的功能，而是用于筛选“适应者”。能够顺从既定叙事、避免越界思考的人被保留下来并获得继续前进的资格，无法适应、试图独立判断的人，则在升学、评价与机会分配中被逐步淘汰。最终，教育演变为一个持续削弱独立思考、强化服从意识的过程。它训练的不是如何成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而是如何成为不制造问题的人。

5. 没有参与权的社会：法律从不需要你的同意

在中国，普通人一生没有见过选票，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无需被征求同意，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人们被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却从未被赋予与之对应的纳税人权利。

出行政策的变化是典型例子：先是全面禁摩，随后民众转而选择电动车，不久电动车也被限制，新国标将速度压到甚至低于自行车，却仍被强制执行。规则如何

变化，从来不取决于使用者的现实需求，而只取决于行政意志。类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更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河北省的农村老人无力负担燃气取暖费，但为了不影响旁边“北京蓝天”的形象工程，被禁止烧煤取暖。对农民而言，烧煤是最现实、也是可负担的取暖方式，但在政策之下，烧煤不仅被罚款，甚至会被拘留入狱。在零下摄氏 20 度的严寒冬季，这种规定既未提供可行替代方案，也未承担任何后果，其荒谬程度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法律和政策并非经由公共讨论形成，受影响者的生存成本、现实可行性与风险后果，并不构成决策前提。当一个社会只要求个人承担纳税与服从，却不赋予参与和否决的权利，法律就不再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是单向施加的命令。个人无法成为规则的主体，只能在不断收紧、不断加码的制度框架中被迫适应，哪怕代价是基本的生活尊严。

6. 当医疗费用没有上限

在医疗制度上，美国与中国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美国的个人医疗自付有上限，一旦个人当年的自付费用达到这一上限，后续符合保险范围的医疗支出由保险全额承担，也就是说，费用再高，个人承担是封顶的。而中国并没有兜底上限，中国的医保逻辑完全不同。它不是“你最多掏多少钱”，而是“医保最多给你报多少钱”。医保一旦报完，剩下的风险全部由个人无限承担。

在中国，住院往往要先交钱，不交钱就无法继续治疗，而为医疗费用在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募捐，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认的求生方式。所谓医保，在很多关键时刻只是参与报销，而不是兜底保障。医疗体系也存在双重标准。普通人为了治疗费用四处筹款，而共产党干部却可以长期占用高等级医疗资源，在 ICU 接受免费治疗，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权力结构在医疗体系中的直接体现：谁有权力，谁就拥有不计成本的生命保障。

7. 食品安全失守

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并非偶发事故，而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连婴儿吃的奶粉都会造假。吃得安全并不是被制度保障的权利，而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运气，监管往往在曝光前失灵，在舆情后介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问题不在商户的道德，而在制度结构，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守法成本，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联，问题食品得以反复流入市场，健康风险却由普通消费者承担。食品安全的失守，是普通人被迫为制度失灵持续买单的缩影。

8. 编制体系下的身份断层只保障少数人

相对稳定的保障主要集中在公务员体系和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企业，而绝大多数民营岗位长期处于低保障、

高风险状态。这种差异并非市场结果，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国企依托行政资源和准入壁垒，在多个领域无孔不入、与民争利，持续压缩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甚至对企业进行“跨省远洋捕捞”，即异地执法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跨越行政区域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抓捕。民企利润被挤压，用工成本被压低，风险最终转嫁给普通劳动者，导致民营岗位普遍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热衷“考公”、“考国企”只是避险本能。当安全感只能通过进入体制获得，社会活力与创新自然被抽空。更讽刺的是，即便在政府和国企内部，大量一线岗位同样被外包，脏活累活由低保障人员承担。是否稳定，取决于身份，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劳动。

9. 官本位结构中的职业歧视

中国社会中最普遍、也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歧视，是职业歧视，其根源不在市场，而在官本位结构。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而非选票，因此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社会和纳税人负责。在这种体系下，公务员被普遍视为“最优职业”。在职时，工作强度相对较低，福利待遇和安全感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退休后，即便不再创造社会价值，却享受最高等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远超其他普通劳动者。这些福利来源于民众的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剥削。

与之相对，农民、清洁工、外卖员、保安等基层岗位被系统性贬低，“农民工”这一称呼将职业、出身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标签。

10. 户籍制度制造的内部分裂

地域歧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制度化并被持续放大。严格的户籍制度将资源、福利与身份绑定在户籍地，使人口无法自由流动。

城乡对立与地域污名化并非文化偏见，而是制度性分配不公的产物，“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谚语早已揭示问题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留守儿童这一全球罕见的现象，更是户籍制度直接制造的社会后果。

11. 房子掏空了普通家庭

中国的购房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土地设置的各类税费，本质上是通过住房将家庭财富转移到了政府。对购房者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环境下，大量烂尾楼问题长期存在，购房者既拿不到房，又必须继续偿还房贷，几乎无法通过制度获得真正救济，房贷由此成为长期的现金流绞索，住房从安居工具，变成了放大家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12. 年龄作为被淘汰标准

年龄歧视不仅存在于企业，更由政府官方招聘带头

执行。政府公务员考试普遍设定 35 岁上限，公然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就业法律，将大量劳动者提前排除在制度之外。这意味着人并非随着经验增长而被重视，而是被视为可替换的消耗品。

13. 女性在就业和生育之间被迫买单

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长期承受隐性歧视，生育成本被系统性转嫁给个体。法律存在却难以执行，既压制女性发展，也加剧生育率下滑。女性既被要求承担生育责任，又要为此付出职业代价。

14. 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群体

在中国社会中，一些群体不仅遭受歧视，还被系统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残障人士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很少能看到残疾人，而在美国，使用轮椅的人并不少见。更讽刺的是，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数倍，按比例计算，街头本应出现的残疾人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15. 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无限兜底

在中国，除深圳有限试点外，全国范围内不存在个人破产制度。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普通人一旦无力偿还债务，没有合法清算与“重新开始”的途径，债务会被长期追索，个人需为失败终身兜底。

与此相反，美国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符合法律条件下对无法偿还的债务依法清算。其核心不是纵容失败，而是止损，让失败有明确的法律终点，个人可以承担后果后重新进入社会。结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结构：在美国，失败是阶段性的；在中国，失败往往是终身性的。当一个社会鼓励冒险却不给失败任何出口，债务就从经济问题，变成持续摧毁人生的工具。

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所谓“发展阶段的代价”，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宪法无法约束权力、责任无法追溯的环境中，个体的生命、尊严与未来，就只能被当作可管理、可消耗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并非不知道这种统治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代价，却选择以控制代替纠错、以洗脑代替改革，并通过对外转移矛盾掩盖内部失败。在其统治下，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治理对象。拿别国的问题反复对比，无法为自身洗白。统治的合法性从来不是靠“别人也很糟”来证明的，而是靠是否尊重并保护本国人民来建立的。当社会只能靠比惨维持平衡，被质疑的就不该是人民，而是统治者。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拒绝约束权力、否认公民权利的独裁体制。

A Nation of Cutoff Lines: Systemic Deprivation of Rights Under CCP Rule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widely circulated Chinese language narrative of the so called "American cutoff line," which portray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ociety where individuals may quickly fall into homelessness or death after illness or unemployment. It argues that such narratives rely on selective examples and emotional framing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institutional problems and to discourage scrutiny of China's own system.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any government should be measured by its protection of 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s, rather than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untries shortcomings. Against this standard, it outlines structural risks faced by ordinary people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l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are largely symbolic and do not effectively constrain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judiciary lacks independence, and major changes, such as the removal of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demonstrate that legal frameworks can be adjusted to serve power.

Reproductive autonomy has historically been restricted through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while rural populations remain structurally disadvantaged, lacking secure land rights, adequate welfare, and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Education functions primarily as a system of ideological conformity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thinking.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follow established narratives, while critical inquiry is discouraged.

Citizens have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and laws are imposed without meaningful public consent. In healthcare, financial risk is effectively unlimited, as insurance provides partial reimbursement rather than capped liability.

Additional issues include persistent food safety risks, inequality between state affiliated and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and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ousing costs burden families, and the absence of a comprehensive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exposes individuals to long term debt.

These conditions reflect a broader structure in which power operates without effective constrai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legitimacy depends on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consistent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正在消失的中国张雪峰时代

作者：李家亮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张雪峰去世了，确切地说，中国的“张雪峰现象”和张雪峰时代也一起在走向消亡。这位1984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网络爆红考研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老师，教育博主，以其风格直白、观点犀利走红网络，在中国的学生和家长群中影响很大，他的去世突然而仓促，很多中国家长和学生错愕而哀伤，他们自发组成送葬队伍，哪怕相隔千里的人也会用外卖的方式送上一束花，杭州的街头，人们为了张雪峰而落泪。

那些送行的队伍是在送走张雪峰，也是在送走一个张雪峰时代，这个时代将永远尘封在中国的历史里，和历史一起埋葬。

是的，张雪峰时代结束了！

什么是张雪峰时代呢？张雪峰是1984年生人，他在2000年左右参加高考，正好赶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放国门，迎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之后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外贸尤其快速增长，成为了“世界工厂”、吸引了大量外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模式；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爆发，整个中国经济呈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之态。时值政治上是中国独裁体制中相对宽松的胡温时代，两厢结合中国人从上至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对于未来充满希望，那个年代的人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相信爱拼才会赢，相信明天更美好！张雪峰就是和其他八零后一起赶上了那个好时代，那个有希望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像70后一样毕业了包分配，但是却可以迎着上升的中国经济实现那个只要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就可以顺利找到自己心仪的机会，留在一线城市的梦想——很多70后期和80后凭借努力上好大学就可以实现从农村到一线城市精英的阶层跨越。这一代人也是最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爱拼才会赢的那一代，这就是张雪峰时代，或者“张雪峰现象”时代。

如今张雪峰去世了，“张雪峰现象”时代也迎来了尾声，确切地说，“张雪峰现象”比张雪峰更早地迎来了生命的枯萎期。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更专制的集权化（如修改宪法避免自己下台），经济上不断倒行逆施，不断和美日等主流国家产生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的国家指责中国未完全遵守某些规则，不断地破坏WTO运行机制。中国虽然没有正式退出WTO，但是中国和WTO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尤其近年来，大量的外资诸如SAS Institute、IBM、Amazon、Canon、Panasonic、Suzuki、Honda、

Toyota、Old Navy、GAP、Carrefour、John Deere、Kato Works等都全部或大部分撤离中国搬到经商环境更为宽松的东南亚国家。习近平一顿骚操作：减少民营加强央企使得民营经济直接凋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行业全面崩盘，配套外资的制造业大面积关停等，中国经济陷入了中共执政以来的又一次冰点，这种冰点带来的是机会萎缩和消失，所以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跻身去送外卖、跑滴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整个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卷学历，卷名校，留给普通人或者基本盘的机会越来越少，阶层跨越基本成为痴人说梦，社会生存空间的天花板越压越低，人们被压得抬不起头，原本通过给基本盘社会标准答案和上升通道解析的张雪峰们也就逐步失去市场，和追随他们的基本盘们被永远封印在社会底层的夹缝里，于是张雪峰时代结束了！

张雪峰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离世，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起伏回落回合的结束。这次结束，基本意味着接下来很多年，至少在习近平时代、乃至中共高压极权时代基本盘普通人再无跨越社会阶层的可能，学历改变命运的时代彻底成为了历史，张雪峰时代和张雪峰一样，和着普罗大众的梦想一起埋葬在这个春天。

在社会机会缺失，底层没有出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当下，对张雪峰的崇拜像人们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如今这个时代留给基本盘的机会消失了，张雪峰也恰在此刻离开了人世，令人倍感悲哀，人们前去悼念，送的是他，送的也是自己摇摇欲坠的人生。

是过于商业化；是过于考虑学历回报率而忽视人生的容错率；是把基本盘用一个干瘪的答案甩进原本开阔复杂的真实世界；是让基本盘丧失自我判断能力；是让基本盘更趋同了；是关闭了基本盘对于世界适应修行的宝贵能力；是为了制造焦虑赚的盆满钵满，还是确实帮助了一部分学生和家长找到人生方向，无论社会不同层面对张雪峰本人怎么评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雪峰现象背后真正掌控基本盘命运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给予普通人的人生机会彻底关闭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开放阶段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又一次无尽的黑暗。

再见了，张雪峰；再见了，张雪峰时代；再见了，“中国基本盘”的向阳而生时代！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普通女工到地产巨富

——一则成功叙事的结构性疑问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前不久，富华国际集团荣誉主席、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在北京去世，享年 85 岁。消息传出后，舆论迅速聚焦于她与《西游记》中“唐僧”扮演者迟重瑞的婚姻，以及其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与以往类似公众人物离世后的叙事路径相似，关于她的评价很快被归纳为“励志传奇”：从北京胡同中的普通女工，到赴港发展，再回到北京成为地产领域的重要人物，打造长安俱乐部、金宝街等项目，并以“紫檀女王”之名广为人知。

然而，若对其发家路径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这一“白手起家”的叙事却存在诸多值得追问之处。与其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成功故事，不如说它更像是改革开放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通过特殊渠道与资源整合迅速积累财富的案例之一。这种现象本身，也反映出当时制度转型过程中权力、资源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根据公开资料及其本人陈述，陈丽华早年为高中文化，在家具修理厂工作，并因此获得“第一桶金”。1981 年至 1982 年前后赴香港发展，通过房地产投资迅速致富，至 1986 年已跻身富裕阶层。坊间还流传其在香港低价购入多栋法院拍卖物业并转手获利的说法。

但上述叙事在细节层面存在多重疑问。首先是“第一桶金”的来源问题。较为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她曾通过渠道接触到存放文革时期抄家所得的贵重古典家具，并将其转售获利。若此类说法成立，则涉及两个关键问题：其一，这类物资的取得渠道在当时是否对普通个体开放；其二，这些资产如何在当时市场环境下实现价值变现。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古董家具市场，相关交易极为有限。如果在国内出售，其所得人民币在外汇严格管制的背景下，如何转移至香港用于后续投资？如果选择直接将家具运往香港，则涉及跨境运输审批、进出口管制等多重制度限制。对于一位缺乏制度性资源的普通从业者而言，这些操作的可行性值得进一步讨论。

其次是其赴港路径及初始资本来源。1980 年代初期，大陆居民赴港定居需经严格审批，且通常需具备一定资金证明。若相关说法属实，则其启动资金来源及审批过程同样有待说明。

再看其回到北京后的发展轨迹。陈丽华以“港商”身份进入房地产领域，其代表项目包括长安大厦、长安俱乐部及金宝街改造等。这些项目均位于北京核心地段，特别是长安街沿线开发，在当时属于高度敏感区域，审

批权限集中于更高层级。相关项目的获取与推进，显然不仅仅是一般市场主体所能完成。

以长安俱乐部为例，其定位为高端会员制会所，准入机制严格，更多承担的是信息交流与关系网络构建功能，而非单纯的商业盈利空间。这类场所的存在，本身也反映出当时经济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某种交织。

此外，金宝街项目涉及大规模城市改造与历史建筑拆除，在当时亦曾引发争议。相关地块原有机构与资源属性复杂，其开发过程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同样值得纳入分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信息的“低可见性”。与许多同体量企业不同，富华集团长期以来公开信息相对有限，除紫檀博物馆等文化项目外，其核心业务及项目细节较少进入公众讨论。这种低曝光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外界理解其商业路径的难度。

围绕其早年经历，还存在诸如“保姆背景”等未经证实的传闻。此类说法本身或许难以考证，但其流传范围之广，恰恰反映出公众对这一“成功叙事”的不确定感与解释需求。

相比之下，关于其婚姻的讨论则更为个人化。陈丽华与迟重瑞因京剧相识，婚姻持续三十余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其家庭关系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无需过度延伸解读。

陈丽华的去世，让这一“传奇人生”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值得强调的是，对个体经历的反思，并非否认其在特定领域（如紫檀文化保护）所作的投入，而是试图在更宏观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成功”的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处于制度与市场并行探索的阶段，一部分人凭借信息优势、制度窗口与人际网络，获得了超出常规路径的上升机会。这类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人奋斗”，或许难以完整解释其复杂性。

因此，当类似“白手起家”的叙事再次被反复讲述时，有必要保持基本的审视意识：个体成功固然重要，但其背后的制度环境、资源分配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同样构成不可忽视的变量。只有在更透明与公平的规则之下，市场竞争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可复制性。

逝者已矣，但历史叙事不应止于表层的赞颂。对这些“传奇”的再讨论，本质上是对一段发展路径的反思。如何减少灰色空间、提升制度公正性，或许才是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平等对话，还是错误研判？

——从郑丽文访中看台湾的安全迷思

作者：赵纪森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任何与中国的接触，都难以被视为单纯交流。郑丽文的访中，引发了明显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务实沟通的尝试，也有人质疑这样的判断过于乐观，甚至可能传递错误讯号。

争议尚未平息，她已在上海落地，并受到高规格接待。同时，她的公开发言也将台湾的选择描绘为和平与繁荣，或战争与毁灭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说法，让原本属于政策层面的讨论，迅速转向更强烈的政治叙事。

回到问题本身，关键或许不在于要不要对话，而在于对话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现实判断之上。

在官方互动受限的情况下，非执政政治人物的交流，确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误判风险。国际政治中，维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本来就是避免冲突升高的一种手段。因此，把所有交流一概视为错误，并不符合现实。

但对话从来不是安全本身。它只是一种工具，而且效果高度依赖条件。如果缺乏对等的实力基础，也缺乏基本信任，对话往往难以转化为实质保障。

这也是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疑虑的原因。对于共产党的长期战略，多数人并不抱持信任，这并非单纯情绪，而是来自过往经验与现实观察。在权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单方面释放善意，很可能得不到对等回应，甚至被转化为对方的政治叙事资源。

此次访问所呈现的高规格接待，本身也值得注意。在不对等关系中，礼遇往往不只是礼遇，同时具有明确的政治讯号。这使得相关行动的效果，不能只从表面来理解。

如果将这一争议放入政党竞争的背景，也更容易看出差异所在。国民党倾向通过降低对抗与恢复交流来争取空间，民进党则强调防卫能力与国际合作，将吓阻视为稳定的基础。

这两种路线之间，与其说是立场对立，不如说是风险排序的不同。一种更担心冲突升高，另一种更担心被误判为缺乏决心。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后者的顾虑往往更直接影响安全。

郑丽文的主张，确实回应了一部分人对战争风险的焦虑。但在公开场合所采用的说法，也呈现出另一个问题。当复杂的安全议题被简化为单一选项时，反而容易让判断失去精准度。

两岸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权衡的结构。如果将不同路线理解为和平与毁灭之间的对立，不仅难以促进理性讨论，也可能进一步加深社会分裂。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论述背后，隐含着对现实条件较为乐观的判断。在缺乏对等筹码的情况下，对话本身难以转化为稳定保障；若同时过度强调冲突的不可承受性，甚至可能在无意中影响社会对防卫的认知。

郑丽文的访中，不需要用情绪去否定，但也不应被过度理想化。理解其出发点并不困难，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路径在现实条件下是否可行。

对话可以存在，但不能被高估。

在缺乏实力与清晰底线的情况下，对话未必降低风险，反而可能成为风险的一部分。



引用图片来自于 - 梅花新闻网 - 网址: www.i-mei-hua.co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团结”的名义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民族发展的钳制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202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文本上构建了一套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叙述：平等、团结、互助、融合。这种叙述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想象，并试图以法律形式将其制度化。

当我们将这部法律置于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民族治理实践之中考察时，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浮现出来：这部法律所承诺的“平等与尊重”，在现实中真的具备可验证的制度基础吗？

该法反复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歧视和压迫”，并提出“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些表述在形式上符合现代国家关于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原则是否正确，而在于这些原则是否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是否能够对国家行为形成有效限制。**

在一个以强权国家为特征的治理体系中，法律更多体现为治理工具，而非权利边界。当法律主要用于“引导”“促进”“管理”社会关系时，其对权力的约束功能就会弱化。该法文本中的“平等”与“尊重”，更多停留在宣示层面，而非制度实践。

该法在文化领域提出“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推动文化遗产与发展”，同时第15条中又强调“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数条法条中提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如第11条“引导各族群众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12条“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第14条“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

以上2种的组合本身即蕴含张力。

以近年来内蒙古的语言政策调整为例，内蒙古中小学教育中减少蒙古语授课比例，推广国家统编教材，引发了广泛讨论，现实施行中政府手段强硬，在地方公立教育中不允许用民族语言授课。支持者认为，这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社会流动的必然措施；批评者则指出，这种政策在客观上削弱了民族语言的使用空间，使其逐渐边缘化，更有批评者在2020年行使自身宪法权利的时候，在抗议现场多次被抓捕与软禁。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新疆与西藏区域，双语教育逐渐转向以普通话为主导的教学体系。在形式上，这种转变被解释为“提高就业竞争力”，但在实际效果上，它也意味着把民族语言从“教育载体”转变为“文化符号”，其功能被显著压缩。

从制度逻辑来看，当国家在教育、媒体、公共空间中持续强化统一语言与文化符号时，多样性虽然似乎被承认，在现实中却难以获得对等地位。

这种模式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结构性同化”：差异被允许存在，但必须在统一框架之内运作。

法律中提出“宗教应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表述在中国既有政策中已有体现。其关键在于“适应”的标准由谁界定，边界如何划定？

在新疆，一系列围绕宗教活动的治理措施长期受到关注。例如，对宗教场所的审批管理，对宗教内容的规范，以及对宗教行为的限制。这些措施通常被置于“去极端化”和“反恐”的框架之下进行解释。

在西藏，宗教活动同样受到严格监管，特别是在宗教组织、转世认定、宗教教育等方面，国家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从国家角度看，这种治理模式旨在防范风险、维护稳定；但从权利角度看，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当宗教实践必须符合国家设定的标准时，宗教自由是否仍然是一种“权利”，还是转变为一种“经许可的活动”。

这一转变意味着，宗教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而是被纳入政权统一的政治与治理体系之中。

该法多次提及“反对分裂”“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些表述反映出一个重要象征，民族问题已经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进行理解与处理。

在政治学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安全化”。一旦某一议题被定义为安全问题，其治理方式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政策优先级的上升，手段趋于强化，权利让位于稳定。

新疆的治理模式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反恐与去极端化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管理措施得以实施。这些措施在官方叙述中视为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手段，但在外部观察中，引发了关于人权与自由的持续争议。

当“民族认同表达”被解释为“潜在风险”时，民族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空间将受到极端的压缩。

从制度设计上，该法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组织与公民均提出了要求。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部法律对公民和组织的行为规定更为具体，责任更为明确，而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多为原则性要求，问责机制模糊。

例如，法律规定，国家机关“不履行职责”将被“责令改正”或给予处分，但缺乏独立监督机制来确保问责的实施。

这种结构意味着这部法律更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责任，而非自下而上的权利保障。

在中国缺乏独立司法与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权利条款难以转化为现实中的可操作机制。

法律中多次使用“破坏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念”等表述。这些概念在政治上具有明确指向，但在法律上却缺乏清晰边界。

这种模糊性带来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类似的案件上会有不同解释，执法标准难以统一，个体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变得不确定。

在实践中，这类概念就会被用于限制言论、学术研究或文化表达，尤其是在涉及民族历史、宗教问题或政策讨论时。

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该法特别在强调了未成年人的“民族教育”中体现热爱中国共产党，并特别标注香港、澳门的开展，以及海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约束。

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

第二十一条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

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由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模糊性，违法的这把刀或许就已经悬在了我的头上。

综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了一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团结被置于核心位置，而差异则被纳入统一框架之中进行调节。问题并不在于“团结”本身，而在于当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时，差异如何被对待，权利如何被保障。

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具体实践来看，当前中国对民族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是以统一为目标，以稳定为优先，以政治安全为边界。

在这样的框架下，“平等”更多表现为形式上的一致性，而非实质上的多样性保障；“尊重”则需要在既定政治边界内实现。

因此，这部法律的根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它在语言上强调多元与包容，在结构上强化统一与控制；它将民族问题从“权利议题”转化为“治理议题”，并进一步纳入“安全议题”。

如此，法律不再作为限制权力的主要工具，而成为整合社会与塑造认同的机制。

而这正是更进一步质疑中国政府颁发法律是“虚伪”的制度根源所在。

Unity as Constraint: The Ethnic Unity Law and Structural Contro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2026 Law on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arguing that its promises of equality and respect lack enforceable foundations. While the law uses language of inclus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it functions mainly as a governance tool.

It highlights tensions between diversity and enforced unity. Minority languages are recognized in principle, yet national language promotion and ideological alignment are prioritized. In practice, policies in Inner Mongolia, Xinjiang, and Tibet reflect increasing assimilation.

Religious practice is also regulated, turning freedom into a state controlled activity. By framing ethnic issues a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he law allows stability to override righ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unity is emphasized, while diversity and autonomy remain constrain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跨国镇压看中共全球渗透的威胁

作者：马雪丰

编辑：Gloria wang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近年来，“跨国镇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对身处海外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监控、骚扰、威胁甚至间接施压等方式进行控制。进入 2026 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首先，直接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延伸式打击”，成为跨国镇压的重要特征。2026 年，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是：一名旅居美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其在香港的父亲被判刑。该案件被外界解读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连带施压”，即通过惩罚家属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突破了地理边界，使个人即使身处他国，也难以摆脱来自原政治体系的压力。

其次，在海外直接展开行动的情况也在增加。2026 年 3 月，意大利方面驱逐了 8 名中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参与监视并骚扰一名异见人士。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双方执法合作受影响，也显示出相关活动已经进入欧洲社会内部，引发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2026 年初有人员被指控代表中国公安系统，对当地宗教团体进行情报收集和监控。当地安全机构指出，这类行为属于“外国干预”甚至带有跨国镇压的特征，尤其容易针对移民和侨民群体。

再次，跨国镇压的手段正在变得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根据 2026 年的相关研究，一些行动不再依赖直接执法，而是通过商业渠道、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等方式，对目标进行监控、施压或舆论打击。这种“外包式”或“间接式”的操作，使得行为更难被识别，也难怪被法律界定。

此外，威胁和恐吓的范围也在扩大。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多个国家出现针对特定文化团体和演出的威胁事件，包括匿名死亡威胁、恐吓邮件等，涉及欧洲、北美及亚太地区。这类跨国协调的恐吓行为，显示出其影响范围已具备全球性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跨国镇压已不再是零散个案，而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的跨境行为模式。它既包括对个体的直接施压，也涵盖对信息环境和社群的间接影响。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中共跨越国界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并对各国的社会环境、言论空间以及国家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中共长期以来对于全世界的渗透已经严重威胁到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所幸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中共的狼子野心，并通过执法、立法和国际合作，多层次应对跨国镇压问题，经济上，也开始逐渐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脱钩。

在这次反共浪潮中，我们中国民主党员亦当利用中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共的言论审核框架之下巧妙传播真相以及民主自由思想以进行逆统战，旨在借由中共经济下行，人民不满增加，国际社会提高警惕的机会，在墙内埋下希望火种的同时消耗中共资源，提高中国民主党在墙内的认知度。

中共对于全世界的渗透势必会引起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愿我们中国民主党员以及所有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亲爱精诚，团结一致，我们已退无可退，这场反渗透的战斗，为了自由与民主，我们一定要赢！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the Expanding Reach of State Pow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where a state seeks to control individuals abroad through surveillance, harassment, and indirect pressure. These practices have become more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A key feature is targeting family members to influence overseas activists. Direct actions abroad, including alleged monitoring activities in Europe and Australia, have raised concerns over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Methods are increasingly covert, using social media and indirect channels, making detection more difficult.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have also expanded globall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a structured cross border strategy that challeng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ublic discour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论“爱国主义”的危害

作者：彭小亮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剥削的本质是权力得不到约束，而不是所谓的地主、私有企业、民营经济。特斯拉、索尼、丰田等世界知名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没有权力撑腰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以这些企业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

真正好的法律是保障人权，选举、民主、司法独立、王在法下，保护私有产权。而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做的事情是践踏私有财产、践踏人权，毛泽东从来没有制度建设，也没有私有化改革，而是一个人说了算，每天在家里自大、高傲，喊口号小麦亩产三万斤，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

为什么要希望一个强人来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是希望有良好的法律来把国家治理好呢？毛泽东只是杀的人多得来的皇帝位，搞闭关锁国和慈禧基本没有区别，现在中国的烂摊子就是毛泽东留下的后遗症。

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皇有制，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民有制。所谓的社会主义，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就是不肯把公共资源分发给底层的老百姓，社会主义最终的结局就是集体贫穷和灾难！

中国现在想变好，唯一的道路就是产权改革，然后选举，让民众拿回属于自己的利益，然后引进国外石油，电力，通信、矿产等公司，进行市场竞争把资源价格降下来，然后像美国一样高速免费，让民众富裕起来，保护人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如果世界上只能存在一种歌颂祖国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定是奴役人民的声音。

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皇有和官僚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民有和百姓所有制度。

东方大国的皇帝吃着改革开放的饭，砸着改革开放的锅。

有人权讲人权的国家都是文明的发达国家，有主权讲特权的地方都是独裁专政封建皇有制国家。

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凡人或组织捧上神坛，这个人一定会遭到吞噬，更有甚者可能会借用你孩子的器官为伟

人续命。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谁吃爱国主义这碗饭，他一定会被爱国主义反噬。

如果一个人高呼爱国主义，不是证明了他的伟大和英明，恰好证明了他的邪恶和懦弱。

有爱国主义的地方一定灾难深重，爱国主义泯灭人性践踏人权。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让你闭嘴，让你不要监督公权力，让权贵阶级随意骄奢淫欲，腰缠万贯。

每一个穷苦民众的心中都有一块裹脚布，这块裹脚布就是爱国主义。

人权思想和人权制度才能让社会长治久安，爱国主义独裁思想和制度永远走不出封建王朝更迭的悲惨命运。

贫穷和灾难的根源就是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的存在造成的后果是忽略人最基本的价值为皇权服务，是一种邪恶的法西斯思想。

如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只是仆人，人民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仆人，让主人感恩仆人，这种思想行为模式真的需要进行反思。

西方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公务员不能从国家获得巨大利益，所以从来没有感恩教育，义务教育的课本也没有要求孩子们感恩国家，教育的内容是要求孩子们监督公权力，保障人权，避免社会进入贪腐的恶性循环里。

民主、自由派人群才是真正爱国人群，他们心胸开阔，他们一心想要吸引外资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他们希望国家公务员没有贪腐，他们希望国企没有垄断，民众可以平等就业，他们希望食品安全，民众能吃的放心，民众能被善待。

反观那些口号爱国的盲从之人，他们抵制外资，减少民众的就业机会，他们对贪腐和不公视而不见，他们对糟糕的食品安全做闷头鬼，他们对走失的年轻孩子漠不关心，他们对农村弱势群体毫无善意，他们正在实践

他们的人生格言沉默是金。

贪腐的根源其实就是产权没有明晰，民众几千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哪怕是百姓的生命也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就是因为美国是完全私有制的国家，所以美国总统不能去贪污私人 and 民营企业的财产，这样就从制度上杜绝了贪腐。

美国有一整套完整的约束权力的法律、制度、思想、文化，从而告诉总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哪怕是白宫常年失修，也需要总统自己私人掏腰包 3 亿美元来给政府修缮大楼，因为总统本能的知道这笔费用，有立法权的国会可能不会通过。

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从秦皇汉武开始到今天，国家都是用野蛮暴力的方法武力夺取政权，所以都是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慈禧、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说通俗一点，国家的所有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永远停留在人治社会的贪腐中不停的挣扎、徘徊和轮回，不要说一个小民没有安全感，有可能皇帝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人权才是保障社会能长治久安，每个人都能安全幸福活着的唯一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名人名言：

“跟着美国人混，有面包也有自由。跟着苏联混，有面包没有自由，跟着他们混，即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先生

“帮魔鬼唱赞歌，终将被魔鬼抛弃，成为魔鬼的祭品。”
——英国原首相 撒切尔夫人

“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能生活的国家。”
——德国裔美国籍科学家 爱因斯坦

“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英国经济学家 哈耶克

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民族主义，是民粹思想，是法西斯，是特权和独裁，如果真正为了您的孩子着想，请站在自由一边，切勿站在民粹和独裁者一边，切勿站在公有制国家一边。

在爱国和爱民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爱国本质意义就

是让孩子成为国家的炮灰，让孩子为国家服务；爱民的意义在于：国家只是物业公司，国家是服务民众的工具。

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保障人权、追求公平公正的国家才是正常国家，如果利益被少部分人瓜分，民众一贫如洗，民众的脑子被洗得一干二净，这样的国家就是法西斯的独裁国家。为人民服务，人民却一贫如洗，为人民服务的人却腰缠万贯，切勿让“为人民服务”成为表面宣传语。

一个 13 亿人都想做官的国家，官没有做成，最后大家都成了奴隶。民众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承包着公有和集体的土地，民众没有自己的房子，居住着国家卖给他们的 70 年产权的房子。民众们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汽油，交着世界上最贵的社保，缴纳着世界上最贵的房贷利息，死之前要把一生的财富献给医院。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阶层，个个都是数万亿资产，他们个个都是富可敌国，这些财富难道不是剥削民众所得吗，所以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非常适合奴隶制度，因为他们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制度。民众被自己的皇帝野蛮的剥削和压榨，这个就是大部分人贫穷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本质上还是奴隶制和封建帝王制度。西方哲学家罗素、洛克、孟德斯鸠、哈耶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有同样的思想表述：大部分人的公有制其实就是少部分人的私有制，少部分人霸占着公共资源，比如石油、通信、电力等，从而垄断和剥削民众，公有制是毁灭一切平等、人伦道德、文化良知的源头。所以私有制和私有产权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文明的基石，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人权。

同胞们请行动起来，宣传私有制，宣传私有产权，抵制封闭式教育，宣传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生活在有爱、有尊严、幸福安康的世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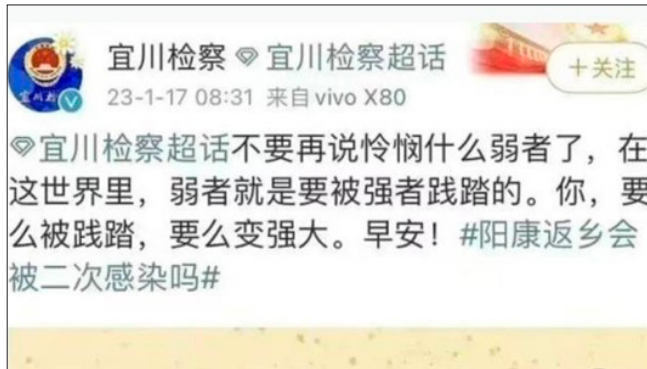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公民需要法制社会，中共要你“顾全大局”

作者：卢超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3年初，陕西宜川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弱小是一种错，那你就只能等着被践踏。要么被践踏，要么变强大。”

这句话虽然很快被删了，但它像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那种隐秘的丛林法则摆到了台面上。它传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权力面前，如果你不够“强大”，你的权利被践踏就是理所当然。这哪里是法治，这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

一、被层层包装的“大局观”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顾全大局”。

当你的房子被违规强拆时，有人让你顾全城市发展的“大局”；当你的合法言论被莫名封禁时，有人让你顾全社会稳定的“大局”；当法律程序被随意跳过时，有人告诉你这是为了效率的“大局”。

在这种逻辑下，“法制”变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折叠、随时修剪的纸。权力阶层之所以一直弱化法制的严肃性，是因为法制本质上是讲“死理”的。法律讲究的是流程、是权利、是证据。而“大局”则是一个弹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祭出“大局”这个旗号，法律的约束就可以被绕开，权力的运行就能变得“无拘无束”。

说白了，弱化法制，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不容挑战的权力意志”。

二、公民眼里的“法”与权力眼里的“术”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制是救命稻草。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制，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庸且弱小的。我们没有通天的关系，也没有挥霍不尽的财富，我们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那本写在纸上的法律。法制社会应该保证：哪怕你是一个最底层的送外卖的小哥，你在法律面前的尊严也应该和任何一个官员平等。

但对于权力运行者来说，法制往往被看作一种“管理术”。在这种视角下，法律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而是用来管理百姓的。当法律方便管理时，就拿出来用；当法律妨碍了权力的扩张或某种目标的实现时，就把它晾在一边。宜川检察院那句“要么变强大”，其实就是这种权力心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眼里，规则是给弱者定的，而强者可以制定规则，甚至超越规则。

三、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变强大”？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像宜川检察院说的那样，只能靠“变强大”来获得安全感，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崩溃。

因为“强大”是相对的。处长比科长强大，局长比处长强大。如果大家都崇尚丛林法则，那么谁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今天你用权力践踏别人，明天更强大的权力就能践踏你。这种人制社会的恶性循环，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尔虞我诈和互害。

法制社会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强弱对比”给抹平。它告诉所有人：你不必非得变成一个浑身长刺的强者才能生存。只要你守法，你就有权利活得舒坦。

四、写在最后：

人类文明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尊严还给个人。

中共提倡的“大局”，往往是一个没有具体面孔的宏大叙事；而公民需要的“法制”，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桩具体的案子、每一份具体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制社会，就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那个庞大的、冰冷的“大局”时，依然拥有说“不”的底气。我们不需要一个逼着我们变强大的丛林，我们需要一个能让弱者也能体面生活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法制必须高于任何所谓的“大局”。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共产主义体制独裁化趋势：以习近平为例

作者：彭硕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

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当国家机器开始记住你

——你不是被审查，而是被标记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12345 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治，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

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大雪四百年

作者：周敏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之一：红楼梦癸酉本的浪潮是新八旗下民心的暗涌

2026年3月19日，拥有500万粉丝的网红“吃瓜盟主”的抖音帐号被封禁。她以索隐派视角解读《红楼梦》癸酉本而短时间声名鹊起，直播间人潮汹涌。被全网封禁后，她所有的帐号包括别人搬运她内容的帐号，以及一些宣扬汉文化的帐号一并被封。她本人还现身发布了一段认罪视频，视频里表情僵硬，照本宣科地朗读。她宣读的题目是《从大一统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她被封禁的罪名就是以反清复明的角度解读红楼梦癸酉本。

她的被禁，如果仅仅当作关于清朝的新疆西藏和满洲东北的疆域传承合法性来理解，就会错过它背后真正的重量。在中国，每天都有网络帐号因为触及了中共的逆鳞而被封掉。但是这一次，动用了全套政治处理程序，包括舆论定点打压，官方媒体出面点评，当事人公开念稿，随后便全网清零，不留一点点痕迹。这套程序，通常只用于触碰到真正核心神经的案例。

一本近几年横空出世的布满争议的古典小说新版本，何以触碰到了可怕的核心神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来弄清楚，那泱泱五百万人，聚集在一个解读文学的直播间，究竟他们在寻觅什么？

红楼梦从来就不是没落贵族的爱情故事。书的开篇就讲得很清楚：此书“将真事隐去，以假语村言”敷衍。书里正面描述的繁华其实是背景，隐写的毁灭与凋零才是主题。正如书的另外一个名字：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不然就被作者骗了去。

索隐派的核心主张是，这是一部以隐语写成的亡国史书。黛玉等人隐喻崇祯与南明，宝玉是传国玉玺与汉人正统，大观园是凋零的华夏文明。那些精心设计的谐音、象形、诗词典故、草蛇灰线，是一群亡国之人在文字狱的刀口上，把真相隐藏进了另一个不相干的故事里。这套隐喻系统的深邃与复杂度，远远超过一般读者的想象。它把密码编进了汉字结构和读音、文学易经天文中医五行和入道天道的宇宙观，是把整个华夏知识体系作为密码本，实在是呕心沥血多年才能写得出来。当你意识到密码已经编进了汉字的字形本身，你就明白了作书人的绝望有多深，有多不甘心。感叹的是，这些信号穿透了几百年的封锁，还是被今天的一些人接收到了。

风月宝鉴这个名字，繁体的风字里面有虫，隐喻后金满人；月是明的右边，隐喻大明。鉴这个字，就是让读者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懂书里华夏文明最后

一次的荣与辱。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把藏在字形里的刀。那句让人送命的诗——清風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杀机不只在讽刺满人粗鄙，更是那个風字里藏着的虫。在政治高压的时代，无论是满人八旗还是新八旗，连字本身都是武器。

隐喻系统之一是按五行来构建。五行里的金对应白色、肺、秋天、草木枯萎、霜冷肃杀等，书中这些元素无一不是指后金即满人，这已经不是暗喻而是明指了。人参的隐喻贯穿全书始终。人参谐音人身，指明朝军队和反抗力量。贾母早年说“人参咱家多得是”——那是明军尚有元气之时；到了后来，家里只剩陈年须末，已经失去效力——那是南明最后时刻，已经无药可救。这条线从书的开头埋到结尾，贯穿始终，每一次人参出现都是一次文明较量的隐喻，直到最终被大雪掩埋。

这套隐喻系统，在文化水平普遍极高的明遗民中几乎人人皆知。脂砚斋批书时写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他说的不是欣赏喜爱，而是一个“解”——这是破译密码的动作。他在告诉后来的读者，这本书有一把锁，你需要解开它，然后心领神会。作书人与批书人，几乎是在明示读者：以史书读之，知道自己文明从此在暴雪之下白骨如山的真相。

但对于今人，这套密码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接收者。不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不聪明，是因为那个培育出这种文化水位的土壤，被系统性地破坏了将近四百年。文化素养已经被降格到四百年来最低点。满清的文字狱摧毁了敢于说话的人，中共的教育制度摧毁了能听懂的人。两次打击，方向不同，结果一致。

这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失传，这是一整个文明的失忆。这片广袤土地上整体的茫然与混沌，正是满清八旗与新八旗孜孜以求的。

之二：葬花吟至今依然是现代中国人的悼词，而并非过去时

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且能进行深度思考的自媒体账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网络聊天室，已经变成了一个民间的精神社区。当成千上万的人在评论区里通过癸酉本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政治共识时，这个账号就具备了准组织化的特征。中共对任何具有组织化雏形的东西都有着 PTSD。它清空账号，封口，是要强制解散这个精神阵地，让所有人重新回到孤立无援的悲观状态。

每个中国人无论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都知道黛玉葬花。你不得不感叹这个隐喻的生命力。几百年来，葬

花已经被降格为痴情，对生命无常的感伤。其实这是一帮亡国之人，在给自己的文明收尸。不让落花入水——金生水，后金之水——是最后的尊严。入土为安，是拒绝被征服者的体系所吞没。葬花词里那句“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不是少女的心事，是一整个文明拒绝被异族体系吞没的绝望宣言。

癸酉本版本真伪，学界争议未决。但真伪对于我们的论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的解读框架，在2026年的中国，为什么能引爆五百万人的共鸣。

这肯定不是一部古典小说突然流行起来，而是这套索隐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在高压环境下再一次命名现实的能力。当博主分析“内鬼开门、外敌屠城”，听众想到的是什么？当她细数大观园如何从繁华走向被抄，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几百年前的隐语，与今天网络上的“毒菜”、“西朝鲜”、“两百斤”、“皿煮”，是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时代版本——高压之下，真相找不到直接的出口，就以隐喻的方式从地下渗出来。

几百年过去了，手法是一模一样的。这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深的悲剧之一。

那种命名能力之所以令人如此渴望，是因为在它缺席的地方，人们甚至失去了表达自身处境的语言。一个没办法用正常语言表达的痛苦，是没办法反抗的痛苦，因为它无法被承认。癸酉本给了那五百万人一套词语。

五百万人聚在一起，是在读一部古典小说吗？他们是在做一件政权最恐惧的事：彼此辨认。一起在文字中围炉取暖、剖析自己的来龙去脉，这是在备份记忆：这些关于文明、历史与风骨的激荡，在网络之洋中，感受到了一丝属于华夏魂魄的温度。癸酉本这份“雪下的底稿”，作者们在令人看不见的维度里，静静看着那场雪，也看着自己的后人。希望这些后人即便身处鱼肉之境，也始终保有那份惊天动地的聪慧。

原子化社会的统治逻辑，依赖于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孤独。但当五百万人通过同一本古书，感受到同一种疼痛——这种孤独感在一瞬间崩解了。人们发现：原来真的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场雪。

清朝和中共费尽心机想让民众看“正面”的太平盛世。而癸酉本的解读和对今天中国现状的联想，就是那面强制转到背面的镜子，让你看清白骨，看清真相，而且这面镜子无法被砸碎。

这是封号令真正要消灭的东西。不是那位博主，她只是不经意间拨动了最核心的红线，更不是癸酉本本身，而恰恰是那五百万人之间刚刚建立的、那条细如发丝却真实存在的共识的神经线。

之三：新八旗，一个需要被说清楚的结构

理解这次封号，需要先理解一个词：新八旗。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以血缘和军事功勋为基础的特权体系。旗人从事生产，由国家供养，在法律、经济、

政治上享有凌驾于汉人之上的系统性特权。这套制度的设计逻辑，是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永久性地建立一道无法流动的身份墙。

今天的中国，这道墙换了个德国思想+苏联体制的面孔，结构如出一辙。

苏维埃、太子党、红二代、军属、高干家庭——这个群体在政治准入、资本积累、司法豁免、教育资源上的系统性优势，与旗人制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一致性。习近平曾在内部场合将自己所在的群体称为“红色江山的天然继承者”——这句话的逻辑，与清朝旗人援引“祖宗武功”的方式，几乎一字不差。

更深的一致性，在于两者对待被统治者的基本态度。

《商君书》说：“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部旨在像羊一样驯化人民的酷法始作俑者商鞅最终也死于他亲手织就的那张法网之中）。清朝通过文字狱和雍发令把这套逻辑刻进人的身体。而当代政权更是打压道家儒家宗教信仰及乡土宗祠等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商君书的法家之酷法，通过无休止的肉体消灭反对声音、经济压力榨干个人时间，通过算法推送的碎片娱乐稀释注意力，通过全景式监控制造永久性的严查。

今天的手段高级精密了，目标没有变：把聪慧变成奴性，把自己的子民变成财产。

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见到的正是这种驯化的成果。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清帝国“没有改善，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把清帝国比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之所以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幸运”。这段写于两百三十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字字都像是写给当下的。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描述中国的富庶，那个令欧洲人惊叹的东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是明朝及之前积累的底子，是那片被铁蹄踏过之前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斯密看见的是遗产。他不知道那个创造遗产的文明主体，已经换了主人。斯密心目中的中国，是1644年之前的中国。

1644年直到今天，这片土地的主人，并不是在它上面几千年劳作、生育、死去的那些华夏子民。

把清朝与中共并置，很多人会反驳：清朝再不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共是中国人建立的政权，怎么能算“外来”？

这个反驳混淆了两件事：人员的本土性与文明逻辑的异质性。

满洲人的身体从东北来，马列主义的思想从苏联来——似乎不同。但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不是中国这片土地自然孕育出的统治逻辑。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更是有个共同的核心动作：系统性地摧毁华夏文明的自然生长能力。

明代晚期，中国正在发生某种内生的变化。江南市民经济的勃兴，李贽的异端哲学，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

明对话，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技术世界的百科式记录——那是华夏文明第一次从内部触碰到某种类似现代性的边缘。这颗从自身土壤里长出来的，刚刚破土。

然后清兵的铁蹄踏过来，把刚刚发出的萌芽连根拔起。

随之而来的就是雍正令，文字狱，是《四库全书》打着修书名义进行的系统性毁书改书。外来破坏者的目的就是对本土文明记忆的定向清除——强迫一个民族用身体的耻辱来内化征服的事实，然后用篡改过的历史告诉他们：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祖法，不遵从的就是大逆不道。

一百五十年后，马戛尔尼来访，他记录下了治理的结果。再过了五十年，鸦片战争。那艘巨大而腐朽的战舰终于沉没了。

然后是民国——四百年大雪中唯一短暂融化的片刻。鲁迅的手术刀，胡适的温润，陈寅恪的傲骨，西南联大在炮火里守护的那一点文明的火种。一时间犹如新星爆发星光璀璨，在思想与科学的各个领域争辉。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尝试转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惊鸿一瞥。虽然后来陷入了黑暗，但在亚洲播下了“主权在民”的火种。这段微光乍现的乱世却是这片土地四百年以来最接近自由的时刻。

然后 1949 年，第二场雪来了。

批孔、毁庙、文化大革命——同样不是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对民国三十余年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文明自信的彻底摧毁。岳飞从课本里消失，鲁迅从课本里消失，先秦诸子从课本里消失，民国从课本里消失。留下的，是一片重新覆盖的白茫茫大雪。

这条线索的解读揭示的一个真相就是：文明的繁荣与权力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反比关系。每一次“盛世”，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荒原。每一次威权松动的“乱世”，反倒是思想与创造力最自由生长的时刻。温柔富贵乡与青枫林里鬼吟哦，盛世与饿殍，翻到背面看才是真相。

康乾盛世，是马戛尔尼眼中“半野蛮”的顶点。中共的伟大复兴，是另一种盛世叙事下的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荒原。

文字狱与今天的管控体系相比，是原始工具对精密机器。文字狱是点对点的恐怖——抓一个人，杀一个人，震慑一批人，它的覆盖面有限。今天的系统是预防性的：在你开口之前，算法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在你搜索之前，那个词已经不存在了。文字狱杀的是已经说出口的话，防火墙、禁止卫星接收、党禁报禁杀的是还没有被想到的念头。

奴役的工具精密了。奴役的本质没有变。这是外来的大雪对中华大地的无情覆盖。

之四：离岸的火种——台湾的文明备份

昨夜朱楼梦，今霄水国吟。薛宝琴的原形有索隐派认为一部分是影射郑成功。

1661 年，郑成功率军渡台。

表面上这是军事撤退。本质上，这是华夏文明在满清全面覆盖大陆之后，第一次成功的离岸备份。他带走的不仅是军队，是汉人的衣冠，明朝的历法，那一整套被清廷正在大陆系统销毁的文明符号。

1949 年，这个结构以惊人的精确性再度重演。又一批人渡海而去，带走了故宫文物、大学教授、出版社的铅字与民国积累的文明基因。台湾在往后数十年里，安静地完成了一件大陆从未被允许做的事：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极权压迫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体面、自由、有尊严的现代社会。

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核心。领土的争议是次要的，致命的是作为参照系的威胁。

只要台湾这个文明社会存在，“没有中共统治就会乱套”的谎言就无法彻底成立。只要海对面的灯还亮着，大陆人就有一个坐标，知道那条被覆盖了四百年的路，并非从来就不存在。

所以必须切断。必须封锁。不能让大陆人看见那面镜子。

多少次在这片海峡的天空和水面挑衅，还有传闻中共不只一次蓄意破坏台湾海峡海底光缆，这是想凿掉镜子的冲动——一个自知形象丑陋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砸掉镜子，而不是洗脸。

清朝的迁界禁海，封的是人的身体。今天的数字长城与断缆阴谋，封的是国人的眼睛。

手段进化了，金銮殿的恐惧还是没变。

郑成功守住了台湾二十年，终究敌不过施琅的坚船利炮。但今天的离岸存储，比四百年前多了一个维度：分布在全球的华夏流亡者，用母语写作、思考、记录的人，是无数个轻量化的节点。这种文明的保存，不再依赖于某一块土地，而是依赖于共识。只要共识存在，文明就没有地址可以被查抄。

之五：暗涌的方向——从情绪到觉醒，有多远

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这股民心暗涌，到底有多大的政治意义呢？

坦白说，癸酉本热潮目前更接近于受压抑情绪的偶然地、本能地聚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觉醒。这两者确实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情绪只不过需要一个发泄出口，觉醒却需要清晰的主动性的方向；情绪会慢慢地被转移和疏散，但是觉醒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

中共非常清楚这个区别，也非常清楚两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才不等情绪演变为觉醒，就在第一时间切断。这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外科手术——会在肿瘤还是良性的时候就抓紧切掉。

但这种切除，也产生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因为每一次封号，都在向那些还没有完全觉醒的人隐晦地传递同一个信息：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政权不希望你看到的，对威权已经产生了威胁。每一次强制念稿认错的视频，都在让那些看懂了的人，对那个此账号不存在的图片背后的精神力量，产生更清晰的感知。

镇压反倒是最好的广告。恐惧是直白的语言。清朝的文字狱杀掉了无数文人，却没有杀死《红楼梦》。它以残本、抄本、口耳相传的方式活下来，然后在数百年后，一个有着五百万观众的直播间里，又掀起了让整个政治机器都紧张起来的浪潮。

这就是暗涌的力量之处。暗涌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它在水面以下，在那些沉默的、原子化的、貌似已经被驯化了的个体内部，缓慢而持续地积累着势能。它可以被压制，被暂时驱散，但依然目睹那艘战舰的船体不可逆地在天道下腐朽着。只要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还在加深，这股暗涌就不会消失。

它只是在等待，静静地拍打岸滩。

然后，是这篇文章必须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中共对索隐派解读的真正恐惧，并不是关于版本考证和关于疆域传承合法性的历史争议，而是在于：一旦那套“外来政权的大雪覆盖了华夏文明”的分析框架被接受，读者会自动完成一个思维动作——把这个框架从1644年，平移到1949年。

这个平移不需要任何人教。它会自动发生。然后那个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再也压不回去：

大清，真的亡了吗？

尾声：记录本身，就是抵抗

《红楼梦》是在政治高压下完成的巨著。作者们用一生时间，在文字狱的刀尖舞蹈，把一个时代的真相隐藏到一个伤春悲秋的爱情故事里。他们预知了这本书不能公开流传，甚至可能最终不再有人能“解其中味”。但还是一边绳床瓦灶、噎酸羹吃苦菜，一边一灯如豆一字一血地写，润色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那些在清朝密室里手抄《红楼梦》的人，也一样知道抄完之后可能无处可送、无人能解，他们还是抄了。这就是文化的传灯，明知不能而依然行。哪怕以后只剩一个人读懂，他们也甘之若饴了。

这多么像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些举起写满愤懑的白纸的人，用谐音暗语在防火墙上凿洞的人，用VPN翻墙出来与世界连通的人。都知道账号随时可能消失，自己在严密的监视下随时会失去自由。他们还是紧紧秉持着这盏灯传下去。

记录本身，就是抵抗。不是因为它能立刻改变什么，而是因为它拒绝了遗忘。

在这个时代，聪慧是原罪。清朝杀掉的是提出“清风不识字”的诗人。中共抹除的是能读懂“末世悲歌”

的自媒体。这种跨越时空的相似，想要达到的目的竟完全一致：必须让华夏民族的聪慧钝化。它要求你只能把聪明才智用在赚钱、互害和赞美上，绝不能用在觉醒上。

一个能读懂《癸酉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它必须让这个民族不仅读不到真本，甚至连讨论真本的空间都没有。

如果网上的“大观园”也被抄没，如果那些试图记录真相的“石头”们被迫消声，这种数字化的焚书坑儒，最终会像清朝那样导致文明的长久停滞，还是会触发某种我们尚未预见到的、更高级或更顽强的文化遗产？

一夜北风紧，华夏尽白头。四百年，山河冰封。这雪，一直下到了今天。

这场雪终有停下来的一天。后来者在寻找来时路的时候，会在雪下找到这些文字。他们会知道，在那段最漫长的寒冬里，并不是所有人都睡着了。

有人醒着。有人依旧在记录。有人把四百年的积雪，一缕一片地细细数来。而你，我亲爱的朋友，在那漫天的雪下，又可曾看到了什么？

Four Hundred Years of Snow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2026 censorship of a popular online commentator who interpreted the Guyou manuscript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t argues that the crackdown was not about literature itself, but about the formation of a shared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readers connect historical collapse with present reality. The surge of interest reflects a deeper, unspoken consensus forming beneath strict control.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dea of a "New Eight Banners" structure, comparing contemporary privilege systems to Qing era hierarchies, where political lineage and loyalty determine access to power and resources. It argues that both past and present regimes rely on suppressing independent thought, reshaping culture, and limiting collective memory to maintain control.

Hidden language, allegory, and coded expression are described as tools people use to articulate reality under censors' hip. The appeal of such interpretation lies in its ability to restore a sense of shared understanding in an otherwise atomized society. Taiwan is presented as a preserved alternative model, challenging claims that authoritarian control is necessary.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while this wave is not yet political awakening, it represents accumulating emotional energy. Suppression may delay it, but cannot eliminate the underlying momentu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民国法统论

作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一

夫国之治乱，不在疆域之广狭，而在其统之所在。统之所自明，则国有其本；统之所自乱，则国虽存而理已失矣。自秦并六国以来，天下归一，号曰“大统”。其所以立者，非出于众之共议，乃出于兵力之征服；非基于民之授权，乃伪托“天命”之传承。故其统也，自上而下，君为国主，民为国属，寰宇之内皆归君之“大一统”。此数千年之常也。

及清室将终，政衰纲弛，内外离心。武昌辛亥一举，各省之民群起独立。于是天下之权，不复统于一人，而分在诸省。是时也，旧统既绝，而新统未立。

然诸省既起，不相攻伐以自立，乃相与议，建政府于南京，定约法以统之。其所以成国者，非一人之力，乃诸省之合意；其所以为统者，非承清廷之余绪，乃创制之新统。

故民国之初，其统为创制之统也。其权自下而上，其国由众而成。中央非先于地方，乃地方所共立；国家非一体之自然，乃众体之所合。是其义，与古之大一统之制，判然有别。

二

既而政局未定，权争日炽。宋教仁既死，议会之路遂阻；二次革命既败，地方之势大减。袁氏专权，改约法，僭帝号，统已失其根本。然此时犹未绝也，诸方争之，尚曰“法统”，是其统虽伤，而犹为天下所认。

及袁死之后，黎元洪复约法，开国会，谓之“法统重光”。然兵权在外，政出多门，制度虽存，不能制权。南北对峙，虽曰“护法”，而实以兵争。

于是复有联省自治之议，欲因地方之势，以成分权之制；又有民国十二年宪法之立，虽无“联邦”明文，而有联邦之实。惜乎悍将横行于北、党军虎视于南。民国十三年，北京政变起。旧政府覆，国会废，宪制尽坏。其后之政，不复以约法为归，不复以国会为本。

自是以后，法统不复为争，而为弃矣。国虽名存，而统实已绝。其后天下之政，皆出于权力之所据，而非制度之所立，是为无法统之世也。

三

国民党改组，立党以统政，建政府于广州，以组织为本，以纪律为用。北伐既起，党军兵锋所至，诸省纳入其制。国家之成，不复由诸省之共建，而由一党之整合；政治之行，不复出于宪制，而出于组织之令。是则党国之制成矣。

其时国共原非相争之党，本处一体之中，然其趋向有异。共匪之术，尤重“无产阶级专政”，其势更趋极权。民国十六年清党起，然党国之制，固已先立，不因清党而终。

既而统一既成，“训政”以行。权归于党，政出于上，地方不复为主体，渐为行政之区。抗战军兴，动员益广，权力益集。其间虽有宪草之议，而未尝行之。国之形存，而统未复也。

及战后，乃制定宪法，于民国三十六年施行，是为第二法统。然其源不在诸省之合意，而在一统之创制。既而共祸日炽，军务孔亟，于是戡乱之例出，宪法之用限，权复归一。

四

未几九州陆沉，国府迁台，疆域虽缩，而统犹存。中央之政，久不改选，号曰“万年国会”；而地方之选，尚得举行。于是县市之间，政尚可竞，权尚可分。民主之萌，不出于中央，而生于地方，駸駸乎辛亥之遗意。其间，士民不甘久抑，或以言论争之，或以选举进之，抗争不辍，积势成流。

由是民权渐张，戒严乃解。及解严之后，总统直选，权归于民。至民国八十九年以后，政党轮替，制度乃定。是则国家之统，复由单一而归多元，由组织而归民意矣。

综观民国之史，可为数段：

其始也，创制而立；

其中也，侵蚀而乱；

其断也，北京政变；

其后也，无法统之世；
继之者，党国之制；
转之者，第二法统；
而成之者，台湾之民。

五

夫民国既起于诸省之独立，则地方为国之本，而非国之属。国家之建，由其合也；法统之立，由其始也。若其统不在，则其合可解。故知国家非不可分之理。地方自为其政，或为联邦，或各独立，皆有其理。此非乱之说也，乃本之论也。

后之论者，或执一统为当然，不问其所由；或以强力为正当，不察其所本。不知民国之义，在其创制，而不在其统一；在其合意，而不在其集中。

明其所自，则知其所归；识其所本，则辨其所正。
是为民国之史也。

六

民国之统既辨，又有一说不可不明：

共匪尝据地而建政，僭号“苏维埃共和国”；又尝于民国三十五年力主联邦之制。然其虽以“独立”“联邦”为名，实则大异于二者本义。

盖共匪肆行残虐，其所本邪说，主以“先锋队”行“无产阶级专政”极权，欲推之于天下。是则其所谓“独立”“联邦”，乃求其极权一统之术也，与分治奚啻云泥。且共匪但据一地，必行列宁、商君之术，其酷政百倍于嬴秦，故无论其主“分治”“统一”，皆为僭伪。有识君子，不可不察之。

民国一百十五年，岁在丙午。
孟夏吉日，书于对岫斋。

On the Legal Continu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legal legitimacy i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argues that true political authority does not arise from territorial unity or military conquest, but from legitimate origin and recognized consent. Unlike imperial dynasties, which derived authority from force and the notion of mandate, the Republic was founded through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provinces following the 1911 Revolution, representing a bottom up cre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The early Republic established a new form of legitimacy based on shared agreement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However, this foundation was gradually eroded by internal power struggles, the collapse of parliamentary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rule. The Beijing coup marked the decisive break, after which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was abandoned and replaced by rule based on force rather than law.

Subsequ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party state system and wartime centralization, further distanced governance from constitutional norms. Although a second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was introduced after World War II, it was weakened by emergency measures and civil war.

The relo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Taiwan preserved the formal continuity of the Republic. Over time, local elec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ventual democratization restored legitimacy through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Republic's true foundation lies in voluntary political association rather than imposed unity, and that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demonst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centralized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为什么和平建党却成了重罪？

作者：Reng Feng (冯仍)
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近日读到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被重判的消息，我心情沉重，也深感愤怒。据《欧洲之声》报道，2025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到2026年1月，多名成员被捕；3月30日闭门开庭，3月3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七年半，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及缓刑。



《欧洲之声》报道截图 - 网址: sinoeurovoices.com

这起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判决之重，而是它再次暴露了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根本荒谬：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当作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结社自由”并不是海外民主人士强加给中国的概念，而是中共自己写入宪法的政治承诺。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宪法文本中，这一条至今仍在。(npc.gov.cn)

问题在于，这样的条文在中国长期停留于纸面。

如果公民真正按照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宣读党章、选举负责人、表达政治理念，本来正应属于“结社自由”的范围；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说明，中共宪法中的“自由”，很多时候只是门面，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禁令。

中共当然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否定宪法。它更常用的

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建立一套审查、登记和监管体系，将公民自由层层架空。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实际上却要求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主管单位审查并依法登记，同时不得触碰所谓“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边界。(xzfg.moj.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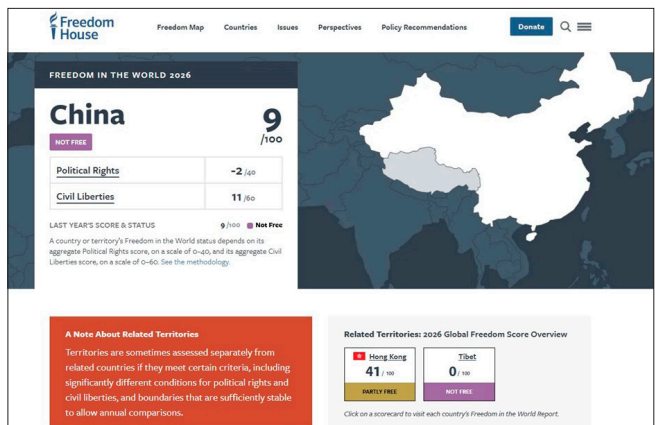
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制度安排早已不只是管理程序，而是政治过滤机制：凡是不挑战体制的组织可以存在，凡是真正独立、具有民主诉求的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空间。

因此，北京党部案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制度的真相：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中国人认真地把宪法上的自由，当成真实权利来使用。

据公开消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所强调的原则是“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所表达的目标是在遵守宪法、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sinoeurovoices.com)

这样的主张，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本应属于正常的公民政治活动；可在中共眼里，却成了必须消灭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结社；不是阴谋活动，而是公开表达；不是非法颠覆，而是人民不再甘于沉默。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Not Free”，总分仅9分（满分100分）。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 - 网址: freedomhouse.org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个连宪法所写“结社自由”都不能兑现、反而把和平建党定成重罪的国家，何谈真正的法治，何谈现代政治文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例。2026年2月，杭州法院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浙江民主党人邹巍有期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 网址: rfa.org

徒刑三年六个月，独立作家咎爱宗有期徒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案件开庭时家属旁听同样受到限制。

北京案与杭州案，罪名不同，逻辑却完全一致：只要你试图在党的控制之外保留一点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组织空间，维稳机器就会迅速启动。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共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才具有格外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人不是只能永远活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

我自己也是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压迫，而是不敢碰；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在一党专政下，真正像公民那样生活，往往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也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国内仍有人明知危险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地表达民主理念，我心里都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的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并不是没有追求自由的人，见证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也见证中共所谓“法治”常常不过是政治镇压的外衣。

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成立，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北京重新举旗，这说明自由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哪怕中共用抓捕、审判和判刑去压制，也无法消灭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今天被重判的这些民主党人，不应被遗忘。

他们的名字，不应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书里。

海外的我们，也不应只是转发消息后继续沉默。

因为沉默，只会让暴政更加肆无忌惮；发声，至少能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民：问题从来不在人民追求自由，而在一个政权把宪法写成门面，把结社自由写成摆设，把和平建党都视为敌人。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判成重罪。这不是法治的威严，而是制度的自我揭穿；这不是国家的自信，而是专制的深层恐惧；这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

愿更多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愿更多中国人看清这个制度的真相。

但愿中国有一天，不再因为一次结社、一场宣誓、一句真话，就有人失去自由。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olitical Reality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political reality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sentencing of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Beijing branch. Although Article 35 of the Constitution explicitly guarante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ndividuals who attempted to form a political party through peaceful, open, and non-violent means were prosecuted for subversion and received heavy sentenc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case reveals a structural gap between law and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rights remain largely symbolic, while a paralle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gistration control, and political review effectively restricts their exercise. Organizations that align with official priorities are permitted, while independent political groups ar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incident. Similar prosecutions in other regions demonstrate a consistent pattern: regardless of the specific charge,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outside the ruling framework is treated as a threat. The core issue is not public order, but the preservation of political monopoly.

It further argues that peaceful association is perceived as more dangerous than overt confrontation, because it normalizes independent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is context, constitutional language functions as a formal commitment without practical enforcement.

Citing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s of political freedom,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gap between written rights and actual governance reflects broader systemic limits. The prosecution of peacefu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llust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a system that prioritizes control over particip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拆穿“制度优势”的遮羞布

——谁在收割中国人的汗水？

作者：易勇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长期以来，中共叙事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其政权领导。通过对东亚文化底层逻辑的深度剖析，中国人的竞争力源于几千年极端环境筛选出的“生存基因”与“延迟满足”能力。对比日、韩、台、新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揭示了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真相，并非制度神话，而是民间力量在政权权力稍作松绑后的自我修复与爆发。

观察整个东亚文化圈，日本在废墟上仅用 20 余年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台湾与新加坡在缺乏资源的前提下稳居发达行列。这些地区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教条统治，却同样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

究其根本，东亚文明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一种被极端历史环境筛选出的“生存优势”。华夏大地在两千多年间经历了密集的战乱、屠杀与大饥荒，这种残酷的自然选择，使得活下来的族群骨子里刻着极强的耐受力 and “延迟满足”的能力，为了长远目标，可以忍受当下极端枯燥、高压和艰辛。这种特质，才是中国人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无往不利的“核动力”。这种力量早在政党诞生前就已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它不是权力的恩赐，而是祖先用血汗拼杀出的生命本能。

中共常吹嘘 1978 年后的经济成就，却刻意回避了前三十年的荒诞与残酷。在那段黑暗时期，政权通过政治运动打断了中国人的腿，禁锢了百姓的双手。

1978 年后的所谓“崛起”，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制度神话”，而是这个政权终于在崩溃边缘意识到，只要不再折腾，只要松开枷锁，让中国人融入全球化分工，中国人民就能凭借自发的勤勉养活自己。这就像是一个劫匪在打断你的腿后送你一副拐杖，然后每天在你耳边宣称，没有我，你就无法走路。中国人民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他们巨大的吃苦耐劳能力抵消了制度性阻碍。如果同样的文化土壤配合自由、法治的制度，产出的能量绝非今日所能比拟。

讽刺的现实在于，在所有以华裔为主的经济体中，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依然处于落后位置。新加坡的人均产出是大陆的数倍；港澳台的富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文化基因，为何在所谓“先进制度”下，百姓却要承受全球最长的工时、最薄弱的福利和最沉重的税收负担？

真相是中共的宣传掩盖了其掠夺性的本质。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忍耐力，将劳动力压榨到极致，却将创造的财富挥霍在维稳、大撒币和权力寻租上。他们不仅掠夺了财富，更试图掠夺“解释权”，把中国人的坚韧说成

是他们的教化，把中国人的成功说成是他们的功劳。

拆穿这个“没党就没饭吃”的自卑骗局，中国人的成功，是几千年苦难筛选出的基因力量，是每一个在工位流汗、在烈日下奔波的普通人挣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那个政权，东亚人照样能惊艳世界。认清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戳破谎言，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拿回属于自己的，本就不该被窃取的尊严。

Debunking the Myth of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s economic rise does not come from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but from deep rooted cultural traits shared across East Asia, including endurance and delayed gratification. These qualities, shaped by centuries of hardship, form the real basis of productivity.

By comparing mainland China with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and Singapo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imilar cultural foundations have produced strong economies without communist rule. This suggests that growth comes from social capacity rather than political design.

The post 1978 reforms are described as a release of suppressed potential rather than a systemic achievement. Earlier political campaigns disrupted society, while later policies simply reduced constraints and allowed people to reconnect with markets and global production.

Despite this, mainland China still lags behind other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per capita income and social welfa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conomic success belongs to ordinary people, not to th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复活节与八九“六·四”

——当真理被埋葬之后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每年的复活节，都会让人重新面对一个古老而尖锐的问题：当真理被处死之后，它是否还能回来？

两千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一场典型的“体制性处理”——一个不掌握权力、却影响人心的人，被视为威胁，从而被清除。从政治逻辑上看，这样的结局再熟悉不过：制造一个公开的终点，让所有人相信事情已经结束。



而在当代中国，“六·四”事件，同样被处理为一个“必须结束”的历史节点。1989年，北京街头曾聚集无数学生与市民，他们呼喊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更基本的诉求：反腐败、要对话、要表达的权利。然而，随着武力介入，这一切被强行终止。

枪声之后，是更漫长的沉默。与许多历史事件不同，“六·四”并没有在公共叙事中被反复讨论、反思、纪念；相反，它被系统性地从教育、媒体与日常语言中剥离。

仿佛只要不提，它就不曾发生。这正是独裁社会处理“危险记忆”的典型方式。

不仅要结束事件本身，还要结束关于它的一切可能延续。

如果说十字架是对肉体的处决，那么遗忘，就是对历史的二次处决。然而，复活节所讲述的，恰恰是另一种结局。耶稣被安放在坟墓中，封石、看守、确认死亡——一切都符合“彻底终结”的标准。但第三天，坟墓是空的。

复活的意义，不只是生命的回归，而是对“终结权”的否定：权力可以宣告结束，但无法保证结束真的发生。这正是复活与独裁社会之间最根本的张力。独裁体制依赖一种能力——定义现实的边界：什么可以存在，什么必须消失，什么可以被记住，什么必须被遗忘。而“复活”则意味着，这种定义并不具有最终效力。

回到“六·四”。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已经被成功“埋葬”：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被提起、不被讨论、不被教学，甚至不被搜索。但在另一个层面，它却始终

没有真正消失。

它存在于流亡者的讲述中，存在于海外的纪念中，存在于零散保存的影像与文字中，也存在于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埋葬”。换句话说，它仍然在等待一种属于历史的“复活”。

当然，这种复活不会像宗教叙述那样以奇迹的形式出现。它更可能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当更多人重新了解那段历史，当沉默被一点点打破，当记忆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那一刻，就是历史的回归。

然而，复活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在耶稣复活之后，是一群门徒选择站出来见证。他们面对恐惧，却仍然讲述所发生的事。如果没有这些见证者，“空坟墓”只会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同样地，“六·四”的记忆是否能够延续，也取决于是否仍有人愿意记住、讲述、传递。在一个鼓励遗忘的环境中，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也许微弱，但并非没有力量。

因此，把复活节与“六·四”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一种更深的提问：当一个时代试图埋葬真理，我们是否相信它仍然可能回来。复活节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也附带一个条件：必须有人，拒绝把坟墓当作终点。在独裁社会中，真正被恐惧的，往往不是一次抗议，而是那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它不会立刻改变现实，却会在时间中不断积累力量。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被压制的并未消失，被禁止的仍可被记住，那么“完全控制”的神话就会出现裂缝。

或许，这正是复活节在今天最现实的意义：你可以埋葬一段历史，但你无法保证，它不会在某一天，被重新看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枪声之后，是三十七年的沉默

作者：许远舟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人民想要说话。

1989年5月，北京的春天格外热。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最多时超过万人。他们带着帐篷、带着广播，搭起了临时的“民主大学”。他们喊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对话、反腐败、新闻自由。诉求并不激进，激进的是政府的回应。

6月3日深夜，坦克从长安街两端开进来。有学生站在坦克前不肯让路，有市民试图用身体阻拦军队。枪声在夜里响起，不是警告，是实弹。医院里彻夜灯火通明，走廊上躺满了伤者。有人死在广场，有人死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死在自己窗边，只是听见了动静探头看了一眼。那一夜，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血。然后天亮了，军队清场了，广场冲洗干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一夜死了多少人，没有官方数字。不是不知道，是中共不让说。一个叫丁子霖的母亲，她的儿子死在了长安街，她用后半生记录名字：237个，后来更多。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扇再也没有等到人回来的门。

一年，两年，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一个人被追责。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等了三十七年，等来的是每年这一天被软禁在家。中共这个政权，杀了人，还不让你哭。

三十七年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说，这是“政治风波”，已经“正确处理”。但直到今天，你不能在微

博上写“五月三十五日”，你不能在微信上发一支蜡烛，你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站着。一件他们自己说“处理好了”的事，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是因为心虚，才需要这么多锁。

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遗忘机器。不只是删帖、封号、屏蔽关键词，而是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教科书里没有“六·四”，课堂上没有“六·四”，连父母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起。一代一代的传承，传的不是真相，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精心制造的。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多是在完全的信息封锁下长大的。他们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不想知道，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我不怪他们，我怪的是那个系统性地偷走他们记忆的政权。如果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请记住一件事：你的国家，曾经对你的父辈举起枪。

以前的德国为奥斯维辛道了歉，南非也为种族隔离道了歉。至于中共？一个字都没有！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道歉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改变，改变意味着他们下台。所以他们选择：让你忘记这一切！

镇压发生后，西方世界最初是愤怒的。美国、欧洲纷纷发表谴责声明，部分国家实施了对华武器禁运。但愤怒是短暂的，生意是长久的。九十年代，西方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共用经济增长换来了国际社会的沉默，用市场准入换来了外国政府的失忆。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些当年谴责中共的国家大多数早已与北京称兄道弟。他们选择了利益，把那一夜的血留给历史去记录，如果历史还被允许记录的话。

一个永远不需要被选举、永远不需要被问责、永远不会下台的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结构之一。不是因为领导人一定是坏人，而是因为这个结构本身会制造坏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这不是道德判断，这是历史规律。“六·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不是孤例。文化大革命是，大跃进是，新疆是，香港是。每一次都是同一套逻辑：党的存续高于一切，包括人命。只要这个结构不改变，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停止。

“六·四”事件之后，一批人离开了中国。他们在海外建立了杂志、电台、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呼号、坚持。他们老了，有的已经走了。他们最深的恐惧不是被遗忘，而是：等他们这一代人都走了，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夜？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说下去？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回答。

1989年站在广场上的年轻人，今天很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的孩子，很多不知道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不是父母不想说，是说了有危险。这叫什么？这叫对下一代的二次谋杀！

“六·四”不是历史。“六·四”是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执政逻辑，谁敢说“不”就让谁消失。房山的铲车、信宜的警棍、江油的催泪弹，同一套手段，在三十七年后换了个地方在用。

但历史从来不会自动走向公正。纽伦堡审判不是自然发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六·四”的真相与追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一个还记得的人拒绝假装忘记，需要每一个能自由说话的人替那些不能开口的人说出来。不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无声无息，好像从来不存在！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请说出来，请转发出去。记住那些名字，不要让他们的沉默变成所有人的沉默！

别忘，永远别忘！



After the Gunfire: Thirty Seven Years of Sil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June 4, 1989 crackdown in Beijing and the decades of enforced silence that followed. It argues that the central issue confronted by the authorities was not chaos, but citizens seeking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spring of 1989, students gathered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surrounding areas, calling for dialogue, anti corruption measures, and press freedom. Their demands were reform oriented rather than revolutionary, yet the response they received was decisive and violent.

On the night of June 3, troops moved into the city from multiple directions, using live ammunition against civilians. Residents attempted to block the advance, and gunfire spread through major avenues and nearby neighborhoods. Casualties occurred not only in the square but across a wide area of Beijing. By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site had been cleared and visible traces removed. No official death toll was ever released,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was tightly restricted.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acknowledgment, individuals such as Ding Zilin undertook the task of documenting victims, compiling names and testimonies to preserve a record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lost.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in the decades since, there has been no public apology,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r legal accountability. Discussion of the event remains heavily controlled. Keywords are censored, commemorations are prevented, and even indirect references are often suppressed. As a result, many younger citizens have grown up with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what occurred. This absence is described not as organic forgetting, but as the outcome of systematic information control across education, media,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text further argues that this pattern reflects a broader poli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authority operates without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or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checks. Under such conditions,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can take precedence over prot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and similar methods of control may recur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events of June 4 are therefore presented not as an isolated episode, but as part of a continuing governing logic.

Finall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emory and documentation. As witnesses age and firsthand accounts become less accessible, the risk of historical erasure increases. The act of recording, sharing, and discussing these events is framed as essential for preserving public knowledge and maintaining awareness of unresolved questions surrounding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十字架前，我选择相信

——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复活节见证

作者：杜吉平、付静争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每当复活节临近，我的心里总会多一份安静，也多一份思考。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去面对的时刻：关于苦难，关于牺牲，也关于盼望。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他甘愿为世人承担罪的代价。他用爱回应仇恨，用牺牲换来救赎。

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也正因为如此，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信仰的核心。它告诉我们：黑暗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结局，绝望之中仍有盼望。

对我而言，复活节从来不只是圣经中的故事，也不只是宗教传统中的纪念。它已经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命，也进入了我的家庭。

2024年的复活节，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受洗归主。我们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愿意用余生来相信他、跟随他、依靠他。



那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起，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凭着人的力量去面对未来，而是愿意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

到了同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受洗了。当我们一家人先后走进洗礼的水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家庭在信仰中的回应，也是神恩典临到我们家的印记。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一个愿意以信仰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的家庭。

当然，信仰并没有让现实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我们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面对困难，也一样会经历迷茫和不安。但不同的是，信仰让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心里有了真正的安定。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人的环境会改变，世界局势也

会动荡不安，但神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仰并不总是被这个世界理解。尤其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信仰常常会被误解，甚至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信仰自由，珍惜能够自由敬拜、自由祷告、自由见证主名的机会。

这种珍惜，不只是出于环境的对比，更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能被夺走的光。

十字架在人看来，似乎是失败，但在神的旨意中，却成为救赎的开始。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正是这“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今天，当我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更加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人生一切顺利才相信信仰，恰恰是在不确定之中，在风浪之中，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我可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可以选择在家中活出爱，可以选择在孩子面前持守信仰，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不否认我所相信的真理。

这个世界若真的需要光，那就从每一个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开始。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当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前谦卑下来，愿意把生命交给神，那样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

在这个复活节，我愿再次向主献上我的心志：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明天如何，我都愿意继续跟随你。因为我相信，十字架不是结束，复活才是答案；而在主里面的人，也终究不会失去盼望。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为什么在美国举牌反抗中共

作者：卜青松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5年的6月29日，我站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举起一块写着“消灭中共”的牌子。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有人质疑，这不是表演、是不是作秀、有没有意义？

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行为艺术，而是一件极其严肃、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象征着我新生的事情。有人说，为什么是在美国？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被中共消灭。在中共大陆，不要说公开举牌反对中共，即使只是举一张白纸，也可能被带走、被拘留、被判刑、被“消失”。

2022年10月13日中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拉起两幅白底红字标语：“反独裁、反专制”“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这位勇士叫彭载舟。随后，他被戴上手铐带走。此后，他在推特等网络平台上的公开发文被删除。后来，我们只能通过海外媒体获知他的消息。2023年10月12日，美国之音发布独家报道称，透过中国国内的信息源确认，彭立发仍被当局关押在一处未知地点，其直系及旁系家属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截至2024年1月7日彭立发50岁生日之际，他仍被中国当局羁押。同时，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中国大陆地图软件中，已无法再搜索到“四通桥”的信息。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大一学生张俊杰独自一人在主教学楼前举起白纸，被保安拍下照片。“大约五分钟吧，就有一些校领导、教授等冲过来，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就把我架到了一个会议室里面。”校方随后通知张俊杰的父亲将他接回家。回到家乡江苏南通后，父亲强行收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到家两天后，张俊杰迎来18岁生日。生日刚过，父亲便以检测隔离为名，将他骗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俊杰手脚被捆绑起来，推进病房，在精神病房里被关了近半个月。

我想说，在中共统治下，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罪，反抗中共的表达更是罪上加罪、不可饶恕。我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当我没有觉醒的时候，我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可能还会为那种环境所鼓舞；但当我来到美国、见到自由之后，我才真正感到那种恐怖笼罩之下的压抑，也为那些深陷恐怖压迫却不自知的人而战栗。

在美国，我才可以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也看到美国公民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她们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抗议政府，而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所以，我在美国举牌反抗中共，作为一个普通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对举牌嗤之以鼻，说这很低级。我却恰恰认为，举牌是真正民主的基石，也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没有门槛的民主行为，是最重要的民主表达之一。

我是普通人，大多数人也都是普通人。我们想表达、想参与民主活动，却并不总知道该怎么做，如何正确地做，如何恰当地做。我不学中共，不是要去搞那套所谓的“革命”，那是共产主义最邪恶、最暴力的手段之一。

而举牌呢？不需要组织，不需要资源，不需要话语权，你只需要一块纸板、一支笔，以及表达的意愿。我们和平地举着它，和平地站在街头，让来来往往的人看到，甚至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表达。一个人站出来，举起一块牌子，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的是一种信号：

我不同意。这四个字，对举牌的人，对看见牌子的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有人说，你举牌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身份、庇护，或者关注度？

我不回避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人做出公开的政治表达，都一定与自身利益相关。如果一件事情与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承担风险去做？即使你身在美国，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也仍然需要承担风险。2019年，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岱青因在境外发帖，回国时被捕。参与白纸运动的人士在出国后仍受到传唤，且在国内的资产也可能遭到冻结。

而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个环境带来的压迫和限制。仅仅是在微博发一段骂证监会的话，就会有警察来恐吓你；仅仅是因为你的言论没有与中共对股市的正面宣传保持一致，就可能有警察来找你。

所以举牌，不仅与我过去的利益相关，更与我未来的利益相关。我当然要举。

有人说，举牌没有用。但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它否定个体行动的意义，也否认改变的可能性。事实上，举牌不仅有用，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想象。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里，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我们在海外的表达，有机会被国内的人看到，也有机会被国际社会关注。

而举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有人在发声；让沉默的人看到——表达是可能的；让世界了解——事实并不是中共叙述的那样。这些看似微

小、甚至看似无用的行动，长期累积下来，将会爆发巨大的能量。

所以我会继续举牌。我的梦想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公开举起一面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需要担心被带走。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我就不会再恐惧回到中国。

那么，为什么要反抗中共，为什么要“消灭中共”呢？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反对中共，是因为这个政党建立在谎言之上，曾经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作恶。

那些谎言是如此荒诞而可怕。中共说，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可事实是，毛泽东掌权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皇帝，造成了1959年的大饥荒，又残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此而死亡的中国人达1500万至55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中共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带来了中国的新生，但事实是，邓小平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六·四”运动，断送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造成大量死伤。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万人受伤。该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

而习近平时代的病毒谎言、清零政策，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残害了无数中国人。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共——那个包裹在谎言外表之下、内里极其邪恶的中共。于是，我选择反抗，选择消灭中共。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也还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站出来，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不会再选择沉默。

我举起这块牌子，不只是为了表达反对，也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情：中共的恐惧再强大，我也不会再屈服。

愿上帝保佑。



Why I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is a first person account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meaning of dissent. The author describes standing on a street in Los Angeles in June 2025 holding a sign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 explains that this act is not symbolic performance, but a serious expression of personal conviction and a marker of his own transformation after leaving China.

A central argument of the text is that such an action would be impossible in mainland China. The author states that even minimal or symbolic forms of expression, including holding a blank sign or posting dissenting views, can result in detention or punishment. He refers to public cases in which individuals who protested or expressed criticism faced intervention by authorities. These exampl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a broader environment in which speech is tightly controlled and public expression carries significant risk.

The article contrasts this with the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ndividuals there are able to criticize government leaders, participate in demonstrations, and express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of losing their personal freedom. This contrast is presented as a key reason why he chose to act in that setting. For him, holding a sign becomes both an exercise of rights and a demonstration of what he considers a basic form of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text also addresses criticism that such actions are ineffective or performativ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imple acts of protest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democratic life. They require no formal organization or resources, and they allow individuals to express disagreement openly. Even a single person holding a sign, he suggests, can send a signal to others and create visibility for alternative viewpoi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at political expression is often connected to personal interests. He notes that individuals take risks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future concerns, and he does not separate his actions from those realities. Instead, he frames his protest as a response to lived experience and a desire to assert agency.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presents individual expression as meaningful regardless of scale. It emphasizes that speaking out, even in small ways, contributes to broader awareness and demonstrates that dissent remains possib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寻找钱辰昌：即使再平凡的人，也不应该被无声消失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钱辰昌，他出生于1969年，江苏扬州人，中国民心党创办人，《凤凰训》作者。他与我是2023年初在Twitter上认识。那时，他已经从中国一路辗转到了老挝，处在一种近乎流亡的状态。他带着一本尚未出版的《凤凰训》手稿，也带着一个宏大的理想——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我们并不是完全认同彼此观点的朋友，但一直保持联系。在他决定前往美国之前，曾把整整六百多页的手稿拍照发给我保存，作为备份。2023年7月他到达纽约，在那里他参与活动，发展党员，出版书籍，但一切进展未如他所愿。2024年12月，他仍处在等待庇护身份开庭的状态下，毅然离开美国，前往东南亚继续发展他的事业。

在2026年2月，他再次让我震惊，他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他决定回中国。

我当时强烈反对。我告诉他，这样做非常危险。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推翻中共的主战场一定是在中国大陆。

他选择开车从云南边境进入中国。他还对我说，如果48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联系，希望我也能为他发声。那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对话。

从那之后，他已经失联40天。

在钱先生失联48小时后，我曾为是否应该在网络上为他发声而纠结了几天，我害怕将他的信息公开，会对他不利。在某一次活动中我就这件事请教了湾区的一位民运前辈，前辈跟我说：既然钱辰昌在过关前给你发了那条信息，他也意料到自己会面临



这样的风险，假若他现在已经在中共的监狱中了，你还不为他呼号，他很有可能就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还有比这更坏的结果吗？

是的，一个人，可以被质疑，可以被责骂，可以被审判，但不应该被无声地消失。

钱辰昌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公众人物，不是知名领袖，甚至他的很多想法及行为，也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这恰恰就反映出，如果连一个普通人可以这样消失，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

这些年，我们见过一些有名字的人，他们的事迹传遍全球：

站在北京四通桥上的彭立发，将墨水泼向独裁者头像的董瑶琼，教学楼前举起白纸的李康梦……他们因为那一刻的壮举而被世界记住。但即使事件如此轰动，他们的处境至今仍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人，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被持续的关注，甚至连零碎的记录也没有留下。

你们还能记起北京鸟巢玲珑塔女士吗？你们对深圳东门举牌哥还有印象吗？白纸运动时各高校中站在前列的学生现在都还能正常上学吗？

他们可能只是短暂地出现在网络上，然后迅速被删除、被遗忘，像一颗石子投入大海，连一圈涟漪都来不及留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最近湾区的一次分享会上，有人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海外可以成为奥运冠军、诺贝尔奖得主、大牌教授、成功的企业家，却在政治上始终没有相应的影响力？

有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大多数华人只关心自己。这个解释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并不完整。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点，那些愿意站出来的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控制力异常强大、资源高度集中、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对手。在这种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下，仍然有人选择发声、记录、行动……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当他们已经做出选择，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时候，我们至少不应该让他们消失得悄无声息。

所以，我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呼吁关注钱辰昌。

当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得知这个信息后，马上响应并发起行动。2026年3月22日下午，在旧金山湾区的San Jose City Hall举办了一场“声援钱辰昌”的活动。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湾区负责人李海峰在活动开场介绍时说，钱辰昌虽然不为人熟知，但普通人同样值得被声援。他为理想行动、冒险回国，如今失联，我们有责任为他发声。

同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成员的张勇则表示，民运群体中，“知名人士”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都是像钱辰昌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而真正支撑起整个群体就是这大量默默无闻的人，他的纯粹和选择值得重视，也提醒我们：这些人，才是这个群体的基础。

来自“南粤独立”团体的郑永华也前来声援，他说：从未认识钱辰昌，甚至与钱先生的政治立场也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前来声援，我们应该为任何一个被专制独裁压制的人发声。

中国民主党党员、活动召集人之一的周志刚更多的是担心钱辰昌先生现在的安危，希望有更多人的关注，会让有关部门有所忌惮。

其他前来参与活动并且发言声援的人士还有：何冬玲、庄帆、惠汝涛、杨坤、叶良泉。未能前来参与的马湘平，提前为活动写好了横幅。



同一时间，位于洛杉矶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分部，也由史庆梅、何兴强、彭小亮带领，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举行了一场同一诉求的活动，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的朱虞夫先生到场支持。

我们绝不应该遗忘那些被看见的人，但更要记住那些来不及被广泛关注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们身边有一个平凡的人消失了，而没有人发声，那么沉默就会成为一种默许。而当这样的情事一再发生，被消失的，就不会再只是“某一个人”。



The Disappearance of an Ordinary Dissenter: Why Speaking Out Matters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disappearance of Qian Chenchang, a little known political activist and writer, and reflects on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enforced silence. Born in 1969 in Jiangsu, Qian founded a small political group and authored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utlining his vision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author recounts first connecting with him online in 2023, when Qian was already in transit through Southeast Asia after leaving China.

Before attempting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Qian shared a full copy of his manuscript as a precaution. After arriving in New York, he participated in small scale political activities but struggled to gain traction. In late 2024, while still awaiting asylum proceedings, he chose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 his efforts elsewhere. In early 2026, he made a sudden and controversial decision to return to China, stating that meaningful change must occur within the mainland itself.

The author strongly opposed this decision, warning of the risks. Qian acknowledged the danger and indicated that if contact was lost after forty eight hours, others should speak on his behalf. Soon after crossing into China from the Yunnan border region, he disappeared. At the time of writing, he has been missing for more than forty days.

The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dilemma of whether public attention might help or harm such cases. It ultimately argues that silence poses the greater risk. When individuals disappear without public awareness, there is little chance of accountability or protection. The case is presented not as an isolated incident, but as part of a pattern in which lesser known individuals vanish without trace.

The text contrasts widely recognized figures with those who remain unnamed and unrecorded. While some acts of protest gain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many others are quickly erased from public memory. This disparity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y of ordinary participants in political expression.

Finally, the article calls for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collective response. It emphasizes that the issue extends beyond one individual, pointing to a wider environment in which expression carries personal risk. Remembering and speaking about such cases is framed as a necessary step in preserving awareness and resisting complete eras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湾区港人义卖声援记协

摄影记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4月11日，由湾区香港人社区中心（HKCC）及美国香港人会馆（US HongKongers Club）发起，一场以“新闻自由无价”为主题的义卖筹款活动在湾区举行。来自湾区各市，甚至从洛杉矶远道而来的香港人齐聚一堂，以实际行动支持在高压环境下仍然坚守岗位的香港新闻工作者，并向长期捍卫新闻自由的香港记者协会致敬。

主办方代表在开场致辞中指出，媒体不仅承担着客观报道事实的责任，更是法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四权力”，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维系社会应有的制衡机制。一旦新闻工作者无法独立履行职责，公众的知情权亦将随之受损，社会的透明度与公义基础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主持人在介绍香港新闻界现状时，引用无国界记者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2002年获得历史上最高排名：全球第18位，当时香港曾被视为亚洲新闻自由的堡垒。而在刚过去的2025年，香港获得有史以来最低的评分，排名跌至140位，状况等级已跌至接近该组织定义的最差级别（Very serious）。这是香港首次跌入该组织所界定的最差区间，因此，近年来香港记者所面临的环境愈发严峻，压力来自多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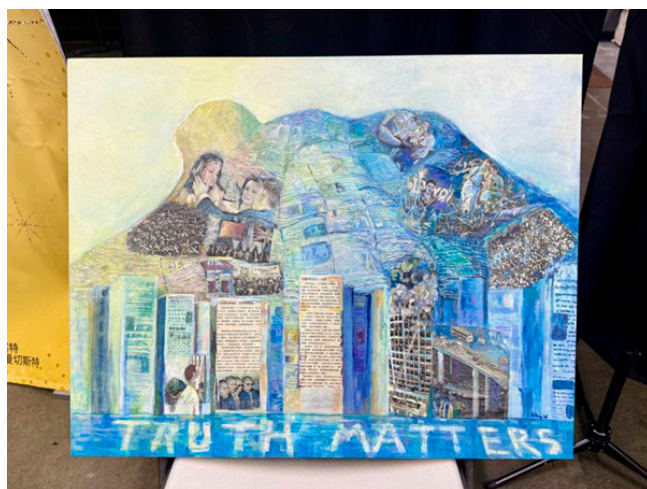
首先，在法律层面，记者及相关组织不断卷入司法程序。香港记者协会近年来持续通过司法复核，为新闻采访权及信息获取权据理力争，但相关案件不仅耗时漫长，亦伴随着高昂的法律费用风险。部分案件虽未能改变整体环境，仍体现新闻界对原则的坚持。其次，行业支援需求显著上升。随着媒体生态收缩，不少记者失去原有岗位，香港记者协会需为受影响从业者提供短期经济援助、专业培训，以及法律与心理支援。这些原本属于行业基础保障的工作，在当前环境下变得尤为关键，同时也对协会的资源构成沉重压力。

在采访环境方面，主持人特别强调，自我审查现象日益普遍且复杂。过去，编辑层面的取舍较为常见；而今日，记者在采访及报道过程中往往需要同时考虑法律风险、机构立场，甚至受访者的安全。有时，即使掌握事实，也需反复权衡是否完整呈现，以避免对他人造成潜在风险。这种“全方位审查”已成为不少前线记者的日常处境。

此外，主持人还提到，香港记者协会在筹款及日常运作上也面临困难，包括活动场地临时取消、资源获取受限等问题，使维持正常运作更加艰难。然而，尽管挑战重重，该会仍持续运作，致力于为新闻工作者发声，并探索支持独立记者及小型媒体的新方式。

当晚活动采取义卖及聚餐形式进行，既为筹款，也让参与者在交流中凝聚共识。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让更多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参与支持行动，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延续对新闻自由的关注。义卖竞拍环节中，与会者反应热烈，港人的坚韧与团结精神，赋予了义卖品更多情感意义，令竞拍价格一再攀升。活动最终筹得的款项，超出主办方预期。

活动最后，主持人再次感谢所有到场人士的支持，并强调，每一份捐助都将转化为对新闻工作的实际支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跨地域的连接与守望，正是新闻自由得以延续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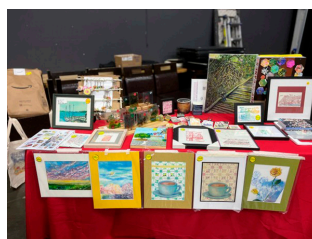
热心人士捐赠的义卖品——以香港狮子山为背景：Truth Matters in the Old Time (2026)。To most Hongkongers,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have always been a right that are there to embrace until they are gone in a flash. However, from the loss of it, we should learn how to use our wisdom and critical minds to grasp and understand truth, especially in this world of fake media.



热心人士捐赠的义卖品——自由无价



热心人士捐赠的义卖品——有湾区名人亲笔签名的周年纪念版红酒一瓶



热心人士捐赠的手工艺品



展示现场筹得的部分款项，主持人感谢热心人士的支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声援民主台湾 谴责国民党主席亲共卖台之旅

摄影记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4月12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成员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举行集会，声援民主台湾，反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政治施压，并谴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访大陆亲共卖台。尽管活动时风雨交加，现场参与者仍坚持完成全部活动流程。

活动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表示，此次活动是在与台湾知名反共人士“八炯”交流后共同推动。他介绍，对方从台湾社会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建议。他表示，作为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对中共体制有切身认识，不希望台湾现有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并认为台湾在华语社会中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秘书长郑云在发言中指出，台湾是一个拥有选举制度、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社会，这些制度性成果值得被维护。她表示，中共近年来透过军事行动、政治施压及压缩国际空间，对台湾形成持续压力。她强调，应清晰表达立场，反对威胁行为，并重申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人民自主决定。

党员郭志军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也包括政治、经济以及信息领域。中共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信息管控，还长期对全球民主国家进行“红色渗透”。他提到社交媒体在舆论影响中的作用，认为相关手段正在改变社会讨论环境，并呼吁台湾方面保持警惕。

党员李翎指出，台湾的民主制度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在外部压力下更需要保持稳定与信心。

党员卫仁喜表示，台湾在现实环境中面临多方面挑战，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要面对被中共裹挟的14亿人口的大陆，处境十分艰难，更令人担忧的是还存在来自内部的压力与分歧，但仍需坚定信心，让民主制度

持续存在并发展。

党员李凯认为，支持台湾不仅涉及地缘问题，也关系到自由与选择权，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

党员卢占强从制度角度分析安全问题，指出台湾真正的安全不仅在于军事装备，区域和平除了依赖军事平衡，也取决于治理结构与权力约束。他认为，一个走向文明、拥抱民主的中国，才是台湾走向长久和平的根本保障，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尊严所在。

党员何聪回顾历史经验，认为过往教训值得关注，并对国共关系提出批评。他表示，推动制度转型、建立民主政体，才是中国与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党员刘静涛表示，台湾的民主就是一面照妖镜，中共惧怕站在这面镜子面前，戳穿中共“统一”的谎言，不能让台湾民主之光熄灭，让这道光照遍大陆各地，中国总有一天会实现民主自由。

党员李树青认为，台湾的现状对部分中国民众具有启发意义。事实证明，在绝对权力下，没有任何真相能存活，我们不能去支持甘当中共“花瓶党”在我们的民主世界存在！台湾是我们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灯塔，守护台湾，保持台湾和平是我们每个爱好民主普适价值观的人民的责任。

党员张善城指出，制度差异是当前矛盾的重要背景之一，如果国民党觉得靠让步能换来平安，那完全是政治上的天真，退掉的不仅是地盘，而是保护自由的底线。台湾的民主是文明的火种，是未来的希望，一旦这盏灯被吹灭，整个民族将再次掉进权力只手遮天的黑洞。

此外，邢贵、吴志创、周忠玉、周小俊等党员及湾区民主运动人士袁强也在现场发言，表达对台湾议题的关注与看法。

在今天众多发言者当中，有几位对于国民党目前的堕落深感愤慨，并喊出“国民党滚出台湾”的口号。对于这些激愤的情绪，郑云特作了补充发言，她也表示对国民党选出一个如此亲共的主席感到难过，但不能一竹竿打落一船人，湾区也有很多国民党党员，比如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盟长赵炳贤，就是有着坚定立场的反共人士。

活动中还有一个播放视频环节，现场播放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学生时期的一段演讲视频，郑丽文早期主张台湾独立与民族解放，她强烈抨击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号召推翻其威权统治，建立独立的“台湾国”，展现出极其激进的反共与反核本土立场。而另一段视频则涉及

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早年的相关言论，引发了现场讨论，他的立场转变体现了流量至上的网红逻辑，从早期的激进批判中国共产党到如今访问大陆为中共站台叫好，其言行往往随政治风向与商业利益摇摆，这种“发卡弯”式变脸，既反映了其个人信念的缺失，也揭示了他在利益驱动下的投机本质。

活动最后，与会者进行象征性表达行动，手撕印有“中共非法政权”字样的纸张，并集体高喊口号，表达对相关议题的立场与诉求：

维护世界和平！

捍卫民主台湾！

声援台湾！

反对侵略！

停止军演！

停止威胁！

拒绝出卖！

守护台湾！

随后，现场多次重复呼喊：

台湾的未来——谁决定？

台湾人民！

再来一次——谁决定？

台湾人民！

在持续的风雨中，参与者衣物被打湿，但活动仍在有序氛围中结束。多位参与者表示，此类行动旨在表达对民主制度与地区和平的关注，并强调台湾安全在当前局势中的重要性。



Rally in San Francisco Voices Support for Taiwan and Criticism of Beijing Pressure

On April 12, 2026,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local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o express support for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and oppose military threats and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Beijing. Despite heavy rain,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event, delivering speeches, displaying slogans, and engaging in symbolic actions.

Organizers stated that the rally was partly inspired by exchanges with pro democracy voices in Taiwan. Speakers emphasized that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including elections,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achievement that deserves protection. They argued that Taiwan's future should be determined solely by its people, without external coercion.

Several participants highlighted what they described as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Beijing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influence, economic leverage,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Concerns were also raised about the broader impact of such influence on democratic societies worldwide. Some speakers urged vigilance regarding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shifts in public discourse shaped by digital platforms.

Others focused on internal challenges within Taiwan, noting that maintaining democratic stability requires resilience not only against external threats but also against domestic divisions. The discussion also included criticism of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volving opposition figures in Taiwan, which some participants viewed as reflecting misjudgment in cross strait engagement strategies.

The event featured video segments showing past public statements by political figures and media personalities, prompting discussion about changes in political positioning over time. These examples were used to illustrate concerns about consistency, credibil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commercial incentives.

Participants concluded the rally with chants emphasizing peace, opposition to military escalation, and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y reiterated that Taiwan's political future should remain in the hands of its citizens.

Organizers described the gathering as part of ongoing civic engagement effort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imed at raising awaren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expressing positions on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黑暗中的星光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纪实

作者：胡景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3月15日下午，第13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在“六·四”纪念馆隆重举行。

坐落于洛杉矶的“六·四”纪念馆，今天再次座无虚席。人群安静而肃穆，仿佛每一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记忆而来。在这样的氛围中，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如期举行。本届奖项授予多位仍身处中国、为基本权利奔走呼号的维权人士与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身陷囹圄，或长期遭受压制，却依然选择不沉默、不退却。



如果将历届获奖者一一排列，那几乎是一条由一个个体的命运铺就的道路——一条通向自由与尊严的“星光大道”。

记忆与延续

“我能来到这里，感到很荣幸。”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朱虞夫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他曾是第一届该奖项的获奖者之一，但在获奖时仍身处狱中，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多年后，当他得知这一切时，仍倍感温暖，那是一种“迟来的温暖”。

然而，这份温暖背后，也夹杂着遗憾。“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被真正看见。”他说。在他的讲述中，时间仿佛被拉长。从上世纪末至今，一代又一代人，在相似的处境中承受着代价。在浙江，一直中国民主党人在不断的坐牢，监狱里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这些民主党人，仿佛参加了一场接力赛，中共安排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地坐牢，从未间断。

当谈及为何争取基本权利如此艰难，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语言，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指出：“在这样

的体制之下，很多权利本身就很难获得。”也正因为如此，他将更多的重心放在“责任”上。“在外面的人，不应该忘记里面的人。”他说，“关注不能只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持续的、具体的。”谈及未来时，他提到一种更深层的支撑——信念与品格。“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良性，不只是制度的问题，也和人的内心有关。要坚持正义，也要保持谦卑。”

沉默与选择

相比之下，史庆梅的表达更为直接。“很多人其实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利，但他们没有勇气说出来。”她将这种沉默归因于长期的压力环境。“当表达意味着风险，人们自然会选择退缩。这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代价太大。”

现在她已经身处一个可以公开表达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牵连。她提到，家人曾经遭遇过骚扰与威胁。“一开始会害怕，但时间长了，也慢慢学会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是一种从恐惧到适应，再到坚定的过程。“如果我不说话，那我离开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她的语气并不激烈，却带着一种清晰的决断。

在她看来，权力之所以对公民社会保持高度警惕，本质上源于对“觉醒”的担忧。“一旦更多人敢于表达真实想法，就会带来改变的可能。”因此，她的期待也显得朴素而直接——希望改变发生，希望更多人能够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荣誉与见证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荣誉。”袁崛这样形容自己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感受。

三年前，他来到美国，此后持续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看来，这一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象征性的肯定。“它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在最基层、最没有资源的环境中发声的人。”

他们最容易被忽视，一旦被带走，很可能就悄无声息。“所以，在他眼中，这个奖项不仅是荣誉，更像是一束光，照向那些被遮蔽的角落。”



当谈及现实，他的判断带有一种冷静的克制。“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至暗时刻’。表达空间在收缩，很多人选择沉默。”但他并未失去希望，反而对故土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历史上常常如此，当压抑走到极端，也可能孕育变化的契机。关键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抓住它。”

同时，他也强调了基层力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往往来自最广泛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正是这数量众多的普通人，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



星光与方向

整场活动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刻意的煽动。更多时候，是一种克制的表达，一种在现实压力下仍然试图保持理性的声音。

这些声音并不宏大，甚至常常显得微弱。但正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讲述，构成了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它穿过纪念馆，穿过街道，穿越苍穹。

会场上的嘉宾，他们谈论的，是权利、是恐惧、是选择，也是代价。

当名字被一个个念出，当故事被一段段讲述，那些原本孤立的经历开始彼此连接，彼此照亮。他们是一个个星星之火，但只要这种火多了，就可以燎原，照亮大陆的那片天空。

或许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当黑暗足够深时，哪怕是微弱的光，也会变得清晰而坚定。而这些光，终将指向远方，指引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Starlight in the Darkness: The 13th Osca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ward

This article records the 13th Osca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ward ceremony held on March 15 at the June Fourth Memorial Museum in Los Angeles. The event honored activist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who continue to speak out for basic rights despite repression. Many awardees remain in imprisoned or under long term surveillance, yet they persist in refusing silence. The gathering brought together participants carrying personal memories and a shared concern for human rights.

Zhu Yufu, an early recipient of the award, reflected on decades of repression. When he was first honored, he was still in prison and unaware of it. Years later, he described learning of the award as a delayed sense of warmth. At the same time, he noted that many individuals like him are rarely seen or remembered. He described a recurring pattern in which activists are imprisoned in succession, forming what he called an unbroken chain. Rather than speaking with anger, he emphasized responsibility, stating that those outside prison should not forget those still inside, and that attention must be continuous and concrete.

Shi Qingmei addressed the role of fear in shaping silence. She argued that many peopl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freedom and rights, but choose not to speak because the risks are too high. Even after leaving China, she experienced pressure through harassment directed at her family. Over time, she described adapting to this pressure and developing a stronger sense of resolve. For her, speaking out is not symbolic, but necessary to preserve personal meaning.

Yuan Jue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who act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He describ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s one in which space for expression continues to shrink and more people choose silence. However, he also suggested that such pressure may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change. He emphasized that real transformation depends not on elites, but on broad participation.

The ceremony itself was restrained and reflective. There were no dramatic slogans, only steady accounts of lived experience. As names were read and stories share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became connected, forming a larger narrative. The event suggested that even small acts of expression can accumulate into meaningful force. Like scattered points of light, these voices illuminate one another and sustain a sense of direction.

In this sense, the ceremony was not only recognition, but also a reflection on persistence. Even in darkness, small lights endure and may guide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揭幕现场，我重新看见高智晟的意义

——参加高智晟雕像揭幕活动有感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4月4日，我来到美国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参加高智晟律师雕像的揭幕活动。站在现场，看着雕像正式揭幕，我心里有很深的触动。那种触动，不只是因为一尊雕像立起来了，更因为我在现场听见了许多不该被遗忘的声音，也因此对高智晟、对中国、对我们这些

流亡海外的人，有了更深的思考。

高智晟曾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律师，甚至被评为“全国十佳律师”之一。但后来，因为他替弱势群体发声，替基督徒发声，替维权人士发声，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最终被吊销执照，遭受绑架、酷刑和长期打压，最后被强制失踪。一个原本可以在体制中安稳生活的人，最终却落到这样的境地，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共体制的黑暗。

在揭幕现场，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高级主任陶智先生的发言，让我印象很深。他提到，高智晟作为一名基督徒，非常清楚地表明：人的尊严，来自于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很受触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基督徒，我越来越明白，中共之所以敢任意羞辱人、践踏人、消灭人，正是因为它根本不承认人的尊严来自上帝，也不承认人在政权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和审判。

而高智晟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那个个人都被逼着低头的环境里，仍然守住了这样的底线。他不只是一个勇敢的律师，更是一个不肯向邪恶妥协的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也太珍贵了。

陶智先生还谈到，中共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美国本土，甚至延伸到我们当天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上。他提到，自由雕塑公园过去曾遭到破坏，陈维明老师的作品和工作室也遭受过袭击。听到这些，我心里既沉重，又愤怒。因为这说明，中共不仅要在国内境内压制不同声音，甚至连人在美国、站在自由土地上，也还想继续恐吓、继续伸手控制。

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并不等于中共的阴影就完全远去了。很多人依然会遭到骚扰、威胁和监视。中共不仅想控制人的身体，

也想控制人的记忆，控制人的恐惧，甚至控制人离开中国以后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在自由雕塑公园为高智晟立像就更有意义。它不只是纪念一位失踪的人权律师，更是在公开宣告：我们不会因恐吓而沉默，不会因威胁而遗忘。

那天站在雕像前，我一直在想，中共为什么会害怕一个律师？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它真正害怕的，不只是高智晟这个人，而是他身上那种不肯低头的良知，是他在黑暗中仍然坚持真理、公义和信仰的生命。因为在一个谎言成为常态的制度里，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控诉。

整个揭幕现场，也让我感到一种特别深的力量。大家聚集在那里，不只是为了看一尊雕像，而是为了共同见证：高智晟没有被彻底抹去，他的名字还在被呼喊，他的精神还在被纪念。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反抗遗忘，反抗谎言，反抗冷漠，也反抗中共最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让一个人彻底从历史和记忆中消失。

作为一个流亡到美国的中国人，那天站在高智晟雕像前，我也更深地感到，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自由的土地上说话、纪念、见证，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只是把自由当成一种环境，而应当把它当成一种责任。既然今天我们还能发声，就不应沉默；既然今天我们还能记住，就不应遗忘；既然今天我们还能见证，就不应退缩。

这次参加高智晟雕像揭幕活动，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像是一次提醒。提醒我不要忘记中国，不要忘记那些仍然被关押、被监视、被消失的人；也提醒我，不要因为流亡生活的忙碌，就慢慢失去对真相和正义的敏感。

高智晟至今仍然没有自由，但他的名字不该消失。

而一个还愿意记住高智晟的中国，才可能还有希望。

Remembering Gao Zhisheng: Reflections on a Statue Unveiling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unveiling of Gao Zhisheng's statue in California. Once a prominent lawyer, Gao was persecuted and disappeared for defending rights. The event highlighted his moral courage and ongoing repression beyond China's borders. For the author, remembering Gao is both resistance against forgetting and a responsibility tied to freedom and consci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第十三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致辞

作者：飘飘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见证第十三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颁发，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代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向本届所有获奖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长期关心中国自由、人权与法治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设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是一种记忆，一种记录，也是一种见证。它见证了在过去这些年里，无数中国公民为了追求自由、尊严与法治所付出的勇气与代价。

今年的获奖者中，有许多名字，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却值得被历史铭记。朱承志先生长期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事业奔走呼吁，即使面对压力与打压，依然坚持发声，坚持记录真相；董广平先生曾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迫流离失所，他的经历让世界再次看到，一个人为了自由与尊严可以承受多大的代价；王一飞先生与常珈瑄先生，同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良知，坚持表达，在沉默与恐惧之中守住了人的尊严。而本届团体奖授予四川泸州“中国民主胜利党”案的全体涉案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普通人，却因为表达政治理想、因为追求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社会，而承受了沉重的打压和惩罚。他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仍然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记住这些名字。历史往往不是由权力书写的，而是由那些在困难中依然坚持信念的人慢慢铺展开来的。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坚持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不再退缩时，历史的方向就会悄然改变。设立这个奖项，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勇敢者不被遗忘，让世

界听见他们的声音。因为每一个坚持良知的人，都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今天的颁奖，不只是对个人的表彰，更是对一种价值的肯定——那就是对自由、人权与法治的信念。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人——他们也许只是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甚至没有安全感。但他们依然选择说出真话，依然选择守住良知，依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这些人，让黑暗不再那么漫长，让希望始终没有熄灭。今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提醒未来——自由或许会被压制，正义或许会被延迟，但人类追求尊严与权利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

愿勇气被记住，愿良知被传承，愿自由的火种，在更多人的心中继续燃烧



Awards Speech Summary

This speech marks the 13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ward, honor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ho defend freedom, dignity,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 emphasizes that the award serves as recognition, memory, and witness to courage under repression. The speaker highlights lesser known activists who persist in truth and conscience despite pressure and risk, calls for continued remembrance, solidarity, and public attention, and affirms that the pursuit of freedom, justice, and human dignity must endure across generations and societies worldwide, sustained by collective memory, moral responsibility, civic courage, and an ongoing commitment to truth,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for all peop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清明节悼念共产主义受难者

—— 勿忘共产政权之罪

记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4月5日清明节之际，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圣荷西市政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与社会政策中逝去的生命，呼吁铭记历史、反思悲剧。



活动发起人李海峰在开场发言中表示，此次集会不仅是纪念个别知名受害者，更重要的是悼念那些“无名无姓、无人记得”的普通人。在中国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大量个体悄无声息地消失，其遭遇未被记录，也未被社会承认。他举例提及聂耳、田汉、彭德怀、刘少奇等历史人物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同时强调，相比这些广为人知的人物，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受害者。

李海峰还讲述了一个来源于《拾纸救夫》的故事：一名教师因课堂言论被判刑，其妻为证明其清白多年捡拾废纸寻找证据，最终在一场火灾中与孩子丧生。这一悲剧被用来象征时代中个体命运的荒诞与残酷。发言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遭受迫害，包括酷刑、长期监禁以及精神侮辱。一些人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自尽，例如老舍在文革期间投湖身亡。

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导致了全球多个国家曾出现大饥荒，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为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历史上多次的政治清洗活动，被冤枉被杀害的人也数以百万计；共产政权长期压制个人自由，破坏道德与社会关系，摧毁历史文化遗产……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对人类文明几无贡献，但其负面影响造成的历史争议至今仍在继续。

来自山东的发言者惠汝涛回忆了1990年代部分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极端执行情况。他称，在部分县域曾出现“百日无孩”运动，对孕妇实施强制引产，甚至导致新生儿死亡等严重人道问题。

何冬玲在发言中指出，悼念历史受难者的意义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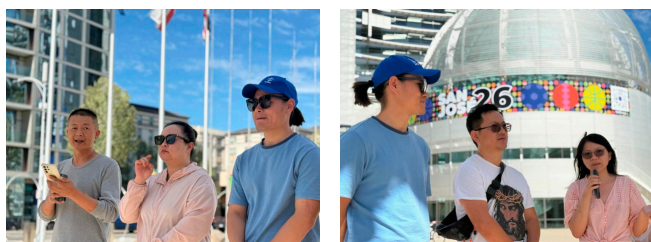
防止悲剧重演。她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维护人的基本尊严与自由应成为社会共识。

朱平则从更宏观角度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多次政治运动，认为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动荡与清洗现象值得警惕。他提到包括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以及六四事件等历史事件，呼吁公众持续关注历史记忆。

出生于1989年的发言者张真真分享了个人经历。她表示，自己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成长，早年对历史教材深信不疑，直到接触互联网后才猛然发现，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在公共讨论中原来是敏感年份，某些历史事件在公开叙述中被刻意回避或存在明显删改的比比皆是。她认为，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展，使更多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并逐渐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她也表达了对仍在中国社会中坚持发声者的敬意。

张勇从意识形态角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提及从苏联时期的清洗到中国历次运动的影响。他结合个人家族经历，讲述亲人曾在政治清洗中遇害的往事，并指出历史对个体家庭的深远影响。他还提到包括三反五反运动、大清洗及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等历史事件，认为不同国家的经验均值得反思。

本次活动在集体悼念与发言中结束。参与者普遍认为，对历史的记忆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警示。在清明这一传统纪念时刻，活动强调“勿忘历史、避免重演”的核心主题，呼吁社会持续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命运与人权议题。



Qingming Memorial Summary

On April 5, 2026, activists held a Qingming memorial in San Jose to honor victims of political campaigns in China. Speakers emphasized remembering both known figures and countless unnamed individuals, highlighting repression, famine, and social trauma. Personal stories illustrated human cost and loss. Participants called for historical reflection,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continued attention to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to prevent similar tragedies in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区举行第 782 次茉莉花行动

——抗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作者：黄吉洲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3月15日下午，第13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在六四纪念馆隆重举行。

坐落于洛杉矶的六四纪念馆，今天再次座无虚席。人群安静而肃穆，仿佛每一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记忆而来。在这样的氛围中，颁奖典礼如期举行。本届奖项授予多位仍身处中国、为基本权利奔走呼号的维权人士与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身陷囹圄，或长期遭受压制，却依然选择不沉默、不退却。

如果将历届获奖者一一排列，那几乎是一条由一个个体的命运铺就的道路——一条通向自由与尊严的“星光大道”。

“我能来到这里，感到很荣幸。”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朱虞夫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他曾是第一届该奖项的获奖者之一，但在获奖时仍身处狱中，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多年后，当他得知这一切时，仍倍感温暖，那是一种“迟来的温暖”。

然而，这份温暖背后，也夹杂着遗憾。“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被真正看见。”他说。在他的讲述中，时间仿佛被拉长。从上世纪末至今，一代又一代人，在相似的处境中承受着代价。在浙江，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不断地坐牢；监狱里始终有中国民主党人的身影。这些民主党人，仿佛参加了一场由中共安排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地坐牢，从未间断。

当谈及为何争取基本权利如此艰难，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语言，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指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很多权利本身就很难获得。”也正因为如此，他将更多的重心放在“责任”上。“在外面的人，不应该忘记里面的人。”他说，“关注不能只是口头上的，而应该是持续的、具体的。”谈及未来时，他提到一种更深层的支撑——信念与品格，“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良性，不只是制度的问题，也和人的内心有关。要坚持正义，也要保持谦卑。”

相比之下，史庆梅的表达更为直接。“很多人其实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利，但他们没有勇气说出来。”她将这种沉默归因于长期的压力环境。“当表达意味着风险，人们自然会选择退缩。这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代价太大。”

现在她已经身处一个可以公开表达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牵连。她提到，家人曾经遭遇过骚扰与威胁。“一开始会害怕，但时间长了，也慢慢学会如何面对。”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是一种从恐惧到适应，再到坚定的转变。“如果我不说话，那我

离开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她的语气并不激烈，却带着一种清晰的决断。

在她看来，权力之所以对公民社会保持高度警惕，本质上源于对“觉醒”的担忧。“一旦更多人敢于表达真实想法，就会带来改变的可能。”因此，她的期待也显得朴素而直接——希望改变发生，希望更多人能够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荣誉。”袁岷这样形容自己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感受。

三年前，他来到美国，此后持续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看来，这一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象征性的肯定：“它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在最基层、最没有资源的环境中发声的人。他们最容易被忽视，一旦被带走，很可能就悄无声息。”所以，在他眼中，这个奖项不仅是荣誉，更像是一束光，照向那些被遮蔽的角落。

当谈及现实，他的判断带有一种冷静的克制。“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至暗时刻’。表达空间在收缩，很多人选择沉默。”但他并未失去希望，反而对故土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历史上常常如此，当压抑走到极端，也可能孕育变化的契机。关键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抓住它。”同时，他也强调了基层力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往往来自最广泛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精英。

整场活动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刻意的煽动。更多时候，是一种克制的表达，一种在现实压力下仍然试图保持理性的声音。

这些声音并不宏大，甚至常常显得微弱。但正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讲述，构成了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它穿过纪念馆，穿过街道，穿越苍穹。会场上的嘉宾们谈论的是权利、是恐惧、是选择，也是代价。

当名字被一个个念出，当故事被一段段讲述，那些原本孤立的经历开始彼此连接，彼此照亮。他们是一个个星星之火，但只要这种火多了，就可以燎原，照亮那片天空。

或许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当黑暗足够深时，哪怕是微弱的光，也会变得清晰而坚定。而这些光，终将指向远方，指引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擦星星事务所

——在沉默的年代，有人还在说话

文 / 《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美编：胡海宁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擦星星事务所，大概是：
一群不愿意闭嘴的年轻人，试着把话继续说下去。

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没有严密结构，也没有那种一眼就能说明白的层级。它更像是慢慢长出来的——从几个人的想法，到一群人的参与，再到一个可以持续发生事情的空间。

一、名字的来历：为什么是“擦星星”

擦星星事务所对自己名字的解释，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为什么叫擦星星？因为一首诗：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作者：谢尔·希尔弗斯坦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
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很朴素、甚至有点倔强的意味：
世界不会突然变亮，但总要有有人去做一点事情。

二、它是怎么出现的

擦星星事务所这样描述自己：

擦星星事务所是一个成立于旧金山湾区的华语青年行动组织。

我们在长夜里抱怨天太黑，我们的抹布上沾着泪，我们有人扶着梯子，有人往上爬，要爬过乌鸦老鹰冲破云，因为总要有有人去擦星星。

如果换成更日常的话来说，就是：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

有些事情在消失，有些话越来越难说，有些记忆正在被一点点抹掉。

于是，有人决定不等环境改变，先把能做的事情做起来。

三、他们在做什么（不是很大，但一直在做）

擦星星事务所的工作，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关键在于持续。

他们自己总结得很清楚：

传递自由思想，书写公共记忆，重塑公民意识，共建离散社群。

听起来有点大，但落到具体行动，其实很简单。

1、把人重新聚在一起

在旧金山湾区，他们会不定期办活动：

- 沙龙
- 分享会
- 小型讲座

人数不多，也不喧闹。

但这些场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让本来分散的人，重新坐在一起说话。

很多人第一次发现——

原来不是只有自己在想这些问题。

2、放电影，让一些影像继续存在

他们会组织放映会。

很多内容，其实你心里都清楚：

在国内已经很难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

比如历史、比如现实、比如那些被删除的记录。

放完之后不会直接散场，而是继续讨论。

这种形式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做一件不普通的事情：

让本来会消失的影像，继续流动。

3、写下来：不让事情就这样过去

他们在 Substack 上持续写作。

写的东西并不刻意宏大：

- 活动记录
- 一些观察
- 一些个人经历
- 对现实的理解

但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不想让这些事情就这样过去。

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很直接：

不停说，到处说，大声说。

这句话有点“用力”，但也很诚实。

4、连接人：把散落的点慢慢连起来

擦星星事务所所做的另一件事，是连接。

连接谁？

- 海外的华语青年
- 不同背景的人
- 不同议题的参与者

甚至包括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

这种连接没有特别显眼的结果，但它改变的是一种状态：

原本孤立的个体，开始知道彼此存在。

四、他们的工作方式

他们自己这样介绍：

擦星星事务所会不定期举办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附近的在地沙龙，放映会，分享会和艺术展览。

我们还会分享友好社团的相关活动和艺术家，写作者的反抗作品。

擦星星专注传播和讨论简体中文世界被审查的内容，不停说，到处说，大声说。

这段话其实已经很完整地说明了它的运作方式：

- 线下活动 + 线上传播
- 自己做 + 帮别人传播
- 内容为核心，而不是组织形式

它更像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组织。

五、它为什么重要

说实话，它并不大，也不“强”。

但它做的事情，有一种基础性的意义：

- 让表达继续存在
- 让记忆不完全断掉
- 让人之间还有连接

在一个很多东西被切断的环境里，这些事情反而变得很重要。

六、它不像什么

它不像政党。

也不像传统民运组织。

它更像一种状态：

一群普通人，没有太多资源，也没有确定的未来，但还是选择做一点事情。

不大，不快，也不一定立刻有结果。

但至少，还在发生。

结语

“擦星星”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说完了一切。

不是去改变整个天空，

而是在承认黑暗的同时，尽量把那一点点光擦干净。

也许这就是它真正的意义：

不是让世界变亮，而是不让它彻底变黑。

附：官方渠道

内容平台：<https://starshiner.substack.com>

社交媒体：X (Twitter) : @starshiner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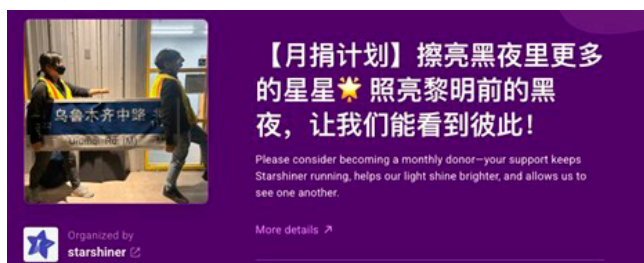
如何帮助擦星星事务所？

有钱出钱，为我们捐款：每月月捐，可以保持我们持续和稳定的发展！

有力出力，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供稿人，擦星星社群的活跃一员！

向身边的人安利我们，传播我们的事业，连接有趣的人认识我们，连接对我们的事业有兴趣的人一起支持我们！

行动起来！！如果您喜欢我们就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请帮你的仇人订阅我们的 Substack 电子报！



政治民主

第三、四、五章

作者：祝正明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三、权力的来源

人们经常说某人有权某人无权，那么什么叫权力呢？权力就是支配别人的强制力，在遇到不服从时，使对方受到各种惩罚的能力。当人们事先就了解到服从的好处与不服从的坏处，形成了感觉上的默契，对某人的指令自觉服从，就可以认为该人拥有权力。如果服从没有好处或不服从没有坏处，权力就会动摇，权威就会丧失，只有奖罚分明，才能维护权威。

权力从何而来？一般来说，权力的来源有五种：威望、暴力、宗教、约定、财富。拥有其中一项，就可以拥有权力，而拥有三项以上，就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

一、威望

人有智商的高低，知识的多寡，能力的强弱，处理各种问题时所使用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周密性不同，因此成功率也就不同。知识丰富、聪明能干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做事的成功率高，如果该人品德高尚，人们自然就会钦佩他、信任他，服从他作出的决定，他就会逐渐具有威望，威望的影响力无形中就会转换成支配力。但是，拥有威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更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在一个群体，只有极少数智能高强、品格高尚的人才能获得威望。

二、暴力

当一方不愿服从另一方时，另一方拥有的暴力能够强制对方服从，否则便可以惩罚对方，而对方反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损失，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使其不得不服从。由此，暴力就衍生出了权力，拥有暴力的一方就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力。军队是用来实施暴力的专用工具，因此，也可以说，拥有军队就可以直接拥有权力。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仅依赖于军队的镇压和威慑而存在，则无异于一个强盗政府。

三、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明的用来解释自身与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意念性学说，许多宗教相信在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的生老病死、旱涝丰歉、吉凶祸福，它们总结出人应遵守的伦理关系，如果违反，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而布道者和宗教领袖由于暗悉其中奥妙，能向人指点迷津，因而获得人们的崇拜。某些宗教在使人们相信了其教义的同时，也将宗教领袖进行了神化，使人们认为他是能够理解、代表神的意志的人，或干脆就是神，他的意志就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使得人们就象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一

样服从他的号召，从而获得对民众的巨大号召力或支配力。

四、约定

一群权利（注：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强制他人服从的强力，权利是指自身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平等的人，事先约定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获胜的一方取得某种利益，失败的一方放弃这种利益，这就是约定。如果失败方不遵守事先约定，旁观者便主动加入，胁迫败方遵守。竞争获胜后享有利益的大小，在事先约定的范围内，获胜者不得随意超越。在一个取消身份等级限制的自由平等社会，这是一种直接以自身能力取得权力的方法，解决了有限的资源在不够分配时出现的问题，并能使有能力的人在短期内脱颖而出，竞争过程本身往往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这种以公平竞争方式取得权利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将竞争规则文字化，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已成社会活动照章有序化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财富

拥有财富者总是可以雇佣别人去干他想干的事，他可以用多给钱去鼓励对方，也可以用少给钱或不给钱去制裁对方，使对方服从他。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雇佣与被雇佣现象。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与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兼容，与人类的智商、能力和本性相适应，为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可。

显然，如果社会体制能保证有威望的人，按公众普遍认可的规则，以公平竞争方式选出领导人，行使事先规定的权力，就能使社会既有高素质的人来为人民服务，又能保证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权力也不会被滥用，只有这种权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权力。

四、道德与法律

随着人口的增加，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有时这种冲突甚至会严重到威胁个人生存的地步，如果互不妥协，时常两败俱伤。因此，在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料变得逐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懂得合作的好处，即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欲望进行适当的克制，作出一定的让步，人们才能和平共处。这就有赖于人们共同遵守一系列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会使个人的行为受到某种约束，但这样做对大家对社会都有好处。这一系列人所公知的，共同认可的、

不需要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就是道德，它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延续而自发产生的，它的约束力依赖的是人的荣誉感和作为群体一员的责任心。在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人员流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人们从小就接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并将其世代相传。当然，不遵守的人总是有的，但这些人付出的代价通常是丧失威信、名誉或被排逐出群体。这种惩罚方式在固定群体内通常是有效的。

传统道德通常只注重熟人、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义务，依靠家族戒律作为实施保障，对解决家庭与部族内部的矛盾行之有效，但对部族之间的冲突，陌生人之间、社团之间的争端时常无能为力。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迅速变化与发展的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以致每代人的习惯都有所不同，道德规范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就会遇到问题。当人们的生活与居住流动性较大时，传统惩罚方式的有效性也会大大下降。这些因素都将使传统道德起到的维持秩序与安定的作用明显降低。由于传统道德的非文字化、含糊性、非强制性，对人的行为不能形成统一的约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复杂多样化，违反传统道德的人就会增加，结果，社会就会表现出道德水准下降，犯罪率上升。

最早设计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求部族之间放弃报复行力，由代表公正的第三方按规定程序，以机械式的审讯方法核定事实，制定惩罚方式和赔偿数额，以调节并最终终止私人争端和部落冲突。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将个人、社团、公司的行为准则及惩罚方式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就形成了法律。

法律本身也可以被当作一种工具，可以为各种政府、阶级和意识形态所采用，为某个阶级服务，因此，法制本身仍然会存在合法不一定合理现象。但是，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依法治国都有好处，它能直接明确地告诉人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统治者按既定的公布的法律来管理社会，防止下层官员凭一时兴起，以临时的命令和草拟的决议来专断行事，减少官僚的随意性对民众造成的危害。

法律较之道德的进步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容表现得更具体、更全面、具有强制性。由于它的执行者是全社会性的执法机构，无人能够逃避，从而使法律成为现代社会维持治安、解决争端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实行法治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法律是否健全；第二，法律由谁来制定。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法治是否能行之有效，是否准确、合理、公正。法律影响着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其作用与传统的道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每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应当关心法律的内容。良好的法律，应能充分代表民意，反映民情，是道德的明文表达形式。

在文明社会，法律是为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

要求全体公民共同遵守，因此，它必须能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它的颁布、修改、废除必须经过全体公民的同意或他们授权的代表的许可，否则，所谓的法律就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法律。

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由社会的统治者或由他们指派的人员来制定。由于统治者有自己的地位、特权，他们的利益不可能与普通公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这种法律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修改法律。法律是辅助独裁者统治的工具，其作用与民众的需要背道而驰，不是用来服务于民众，而是用来管制民众。

法律的不健全的另一表现就是内容粗糙简陋，在许多问题上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或者不详细，含糊其辞，都会给民众造成困惑，给社会带来混乱，使法治的有效性下降，这种情况在专制制度下经常发生，结果大大增加了政府执法人员及司法人员的个人意志对法律的影响，使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实施情况，同样的案件经不同的法官审判，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百姓对执法人员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与控制手段时，这些滥用手中权力的现象就会泛滥，司法人员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法治成了人治。在后门、关系、贿赂比事实、证据、道德更能赢得官司的情况下，公民的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受到素质低劣的司法人员的侵害，最终必将使法律本身威信扫地。我们经常听说的“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莫不包涵着对这种法律的蔑视。

法律的威信依赖于公众对其公正合理性的认可程度，任何一种被公众所蔑视的法律都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五、政体的种类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和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政府管理形式可以按四种模式进行分类：专制模式、经济模式、主权模式、民主模式，见下图：

专制模式	经济模式	主权模式	民主模式
君主家族政府	部落经济政府	单一制政府	君主立宪政府
寡头独裁政府	土地册封政府	联邦制政府	总统制政府
多头贵族政府	私有经济政府	殖民地政府	内阁制政府
政教合一政府	公有经济政府		

1、专制模式

专制统治模式是人类生活社会化以后，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一种最自然的统治模式，尽管原始，却也简便、稳定有效，任何人只要取得统治权，都会以自己的意志建立起能确保自己政令畅通的此种统治方式。

● 君主家族政府：

政府的政治行为由一个世袭家族控制，一人按家族继承规则取得全部统辖权，成为世袭君主，其余家族成员把持政府各要害部门，血亲以外的人进入政府，处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地位，君主对百姓握有绝对的生杀大权。

● 寡头独裁政府：

政府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寡头一人控制，寡头与幕僚之间不一定有血亲关系，寡头通常以某种意识形态将部属聚结在一起，政府要员的行为不受家族纪律的约束，政治决策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易将国家拖入战争，决策效率高，失误大，损失严重，统治往往只能维持一代人。

● 多头贵族政府：

国家政治行为由一批拥有对地方牢固的控制权的贵族或军阀把持，他们自己收税，甚至握有军队，政府领导人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能很容易地调换政府领导人，国家很难形成一致的统一行动。

● 政教合一政府：

政府大小官员兼任宗教的传教士，政府主要领导人被神化，成为民众崇拜的偶像，即便是错误的决策，仍然能被奉为圣旨得到贯彻执行，迷信色彩浓，排斥外来文化，对异议者施刑残酷。

2、经济模式

经济统治模式是指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所有、使用、分配方面的管理方式，经济模式直接而显著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方式。

● 部落经济政府：

部落为基本生产单元，商品自给自足，部落之间甚少商品交易，内部成员劳动分工，财产公共所有，由酋长实行配给制，定期向君主缴纳贡品。

● 土地册封政府：

政府或君主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土地册封给幕僚或大贵族使用，大贵族则将土地册封给下一级的贵族使用，最小的贵族则将土地封给农民使用，农民及下级贵族依次将自己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上一级贵族或君主，贵族不从事体力劳动，练兵习武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公有经济政府：

个人除极少量个人物品外不拥有任何财产，财产全社会共有，社会财富的生产、经营、分配、使用实际上由政府官员控制支配。

● 私有经济政府：

个人社会财产的主人，政府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提成。

3、主权模式

主权模式是指政府权力的产生及使用方式。

● 单一制政府：

国家为一个独立、统一的社会形态，实行同一种法律和管理模式。

● 联邦制政府：

国家由一批相对独立的小国组成，各小国在法律和管理模式上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色。

● 殖民地政府：

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和控制，政府官员由另一个国家指派，实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管理模式。

4、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是指国家的法律政策，政府行为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来控制的政治体制，实行法制，对政府领导人实行分权制和任期制，新闻自由，民选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 君主立宪制政府：

国家有国王或皇帝，但只具象征地位，没有政治权力，权力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掌管。

● 总统制政府：

由经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掌管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

● 内阁制政府：

国家行政领导人由国会议员多数选举产生，通常为多数党领袖，如其失去国会支持，则需辞职。如国会随后不能以多数形成决议，提出新的首相人选，象征性的国家首脑国王或总统在总理的建议下可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全民大选，产生新的议会。

Political Democracy

This text explains political democracy through the sources of power, the role of law, and system types. Power i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to enforce obedience through rewards and punishment. Five sources are identified: prestige, violence, religion, agreement, and wealth. Prestige comes from competence and trust, violence from coercion, religion from belief, agreement from shared rules, and wealth from economic control.

The text argues that legitimate power should arise from fair competition under commonly accepted rules. It distinguishes morality as informal and socially enforced, while law is formal and backed by institutions. As societies grow more complex, law becomes essential but must reflect public will.

Political systems are grouped into autocratic, economic, sovereign, and democratic models. Democracy is seen as the most legitimate, based on participation, rule of law, and limits on pow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回顾】王有才判决书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8] 杭法刑初字第 183 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有才，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淳安县人，无业，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区14幢2单元401室。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假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被刑事拘留，同年八月七日被逮捕，同月三十日被监视居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有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荣华、代理检察员张哲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有才于一九九八年六月结伙他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公然诽谤、诬蔑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上述“章程”及“宣言”向美国、香港等地组织及个人发送了十八份电子邮件。按照事先商定，由其同伙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印刷并在杭州市的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及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同年七月，被告人王有才分别通知他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准备继续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事宜，后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逞。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成员会面商谈并接受1000美元。此外，同年五月和九月，被告人王有才还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资助的人民币4000元、300美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有才对所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其行为仅针对现实社会现象，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进行组建非法政党的活动，一九九八年六月，被告人王有才纠集祝正明、吴义龙（均另行处理）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王有才提出的成立政党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告人王有才与祝正明、吴义龙及王东海、林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独裁”和“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公开发散，同时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协商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被告人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美国、香港等地的组织及个人发送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并要求接收方广为传播。同月三十日上午，按商定由其同伙朱虞夫（另行处理）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

同年七月四日、五日，被告人王有才又分别通知祝正明、王东海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并要求各人尽可能联络其他人员参加，继续讨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经联络，林辉等人赶至杭州，准备聚会。后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得逞。

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杭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的成员会面，就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并接受资助的经费1000美元。此外，被告人王有才还于同年五月、九月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所资助的经费人民币4000元和300美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1、祝正明、吴义龙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与王有才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2、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与王有才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宣言”并决定公开散发；王东海证言还证实当晚进行了具体分工；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文档等书证在案；“宣言”打印件上园珠笔修改的笔迹经鉴定系王有才所写；

3、公安机关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的浏览发现“章程”、“宣言”已发往境外的证明材料；对王有才住处查获的“东芝 Satellite Pro 430 CDT”笔记本电脑中的“发件箱”（NETSCAPE MAIL）检查证实，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该电脑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境外发送了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的鉴定书；胡江霞证言证明该笔记本电脑系其从单位借用，其曾将单位专门配置的网址告诉过王有才；

4、祝正明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据与王有才商定，其将“宣言”交朱虞夫散发；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证言证明朱虞夫在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的“宣言”，经鉴定与朱虞夫、祝正明家中查获的“宣言”内容一致，并系同一版本；朱虞夫的证言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5、祝正明、王东海证言证明王有才定于七月十一日聚会讨论“中国民主党”事宜，并被要求分别通知其他人员来参加；林辉证言证明其按通知来杭准备聚会；

6、公安机关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从王有才住处搜获的邮政汇款通知、美元定期存单及敌对组织成员发给王月才有关资助王的电子邮件在案；

7、被告人王有才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被告人王有才在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与境外组织相勾结，接受资助；其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刑，现又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成立，但指控罪名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王有才提出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经查与事实与法律均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王有才违法所得的 1300 美元（其中 300 美元系被冻结在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为“胡江霞”的“定期一本通”内的存款，帐号：4531711006500900003575），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舒海

审判员 孙伟

审判员 何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冯菁

石头有了呼声

——三十七年前新西兰往事与一代人的不同归宿

作者：陈维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前些日子，奥运花样滑冰冠军之父刘俊前来洛杉矶演讲。演讲前的聚餐中，几位当年被通缉的学运风云人物王丹、王超华都在场。超华大姐现居英国，谈到当年的人和事，我让她转达对杨炼夫妇的问候。

想当年，顾城一家、杨炼一家与我们一家，都定居在新西兰而成为好友。不想今天由超华转来杨炼夫妇在37年前和我们一起在新西兰的合影！这是我们共同举办“面对死亡坚持生命”的行为艺术展上，在奥克兰大学入口处，我用报纸糊了一个大骷髅作为艺术展的入口，合影留念就在此入口处。

想当年大家风华正茂，我们还一起去采石场，购买了一块深红色中国地图形状的花岗岩石头，做64纪念碑用。当石场老板知道我们用意后，把石头送给了我们。

当时我们选用了杨炼的名句“你们已无言，而石头有了呼声！”，当时顾城也写下了「你们死于春天」，我们认为太诗意不够有力而放弃。我还设计制作了十几座血淋淋的雕塑……

今天，有些人已经「两片叶子同时落下」而离世；也有人当了国会议员，从政成功；也有人成了学者教授；也有人投了共而挣得盆满钵满、飞黄腾达；也有人出卖灵魂，当了中共的线人……而我离开了有“白云之乡”美称的第二故乡新西兰，来到了北美的莫哈维沙漠，并重操雕塑旧业，领着一帮甘愿吃苦的义工，把我的记忆和思绪进行固化……



杨炼、友友夫妇与维明、二幼夫妇在艺术展入口处



小选、杨炼夫妇、维明夫妇在采石场



顾城、谢烨夫妇、英儿、圣地、维明夫妇及小木耳、小蒜娃（分别为顾城与维明儿子，当年两人同为两岁）



“六四”纪念碑文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吕
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轮值总编辑：马群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张娜 (副部长)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胡丽莉

美编部：胡海宁 (部长) 阎梦菁 (副部长) 刘敖 (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收稿部：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 (部长) 李建伟 (副部长) 卢超 (副部长) 邢致远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校对部：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孔祥庆

翻译部：彭小梅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周敏 戈冰

采访部：巫伟杰 (部长) 林小龙 (常务副部长) 缪青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方韵 宋娟华 瞿成松 邢致远 [旧金山记者站]：缪青 (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珊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人权观察部：安浦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黄吉洲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外联部：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史庆梅 王海霞

财务部：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副部长)

档案部：侯改英 (部长)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年3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额 (USD)
03.02.2026	BINGLIANG LIU	日常	\$200.00
03.06.2026	LIANJIANG WANG	定向捐朱虞夫	\$200.00
03.10.2026	YUFU ZHU	日常	\$100.00
03.11.2026	XIAOLI ZH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3.16.2026	JINGHUI CHEN	日常	\$2000.00
03.16.2026	LIANJ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3.23.2026	YAPENG YOU	日常	\$50.00
03.23.2026	XIAOLIANG PENG	日常	\$60.00
03.23.2026	QINGMEI SHI	日常	\$100.00
03.25.2026	GUOAN HUANG	定向捐 LGS	\$500.00
03.25.2026	GUOAN HUANG	定向捐朱虞夫	\$300.00
03.27.2026	LIANJ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幕后团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誉墙



吕聪，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行政部部长。任职期间，负责人员登记与日常管理，完善行政流程与组织协调机制，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负责每月评选工作，并在评选后统筹感谢信与委任状的发放，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制作与落实。

她工作作风严谨务实，注重效率与协同，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与执行力，有效推动团队规范化运作与整体发展。



彭晓梅，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翻译部部长，收稿部常务副部长，任职以来，主要负责稿件翻译与语言把关，协助开展稿件征集与整理，保障内容表达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她在工作中，注重语言质量与细节处理，提升翻译准确度与文本可读性，并在翻译与收稿协同中优化工作衔接，为刊物内容建设提供支持。

OPPOSITION PARTY

高智晟 (1964年4月20日 -?)
中國良心律師 · 三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因捍衛人權
被強迫失蹤十年
“為了自由與尊嚴，我願付出一切代價。”
這是他的誓言，
也是我們的接力棒。

